

林政與林產分合不定：戰後初期臺灣 環境秩序的重整與爭議

洪廣冀 張嘉顯

摘 要

二二八事件後的臺灣省政府該如何重整臺灣社會、經濟、政治與環境秩序？對此問題，研究成果集中在政治與經濟方面，環境史的考察仍付之闕如。本文以林業為例，特別針對「林政與林產分合不定」此林業史上惡名昭彰的事件，結合官僚研究的視野與多元史料，探討該事件的前因後果。林政與林產為林業術語：林政負責保林、造林與林產處分（查定國有林班地上之林木價格後，售賣給業者伐採），林產則經營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等針葉林場，如同一般伐木公司，靠伐木與木材銷售獲利。既有研究在處理林政與林產的分合爭議時，多將之類比為保育與開發的衝突，或將之指為省府青黃不接時之政治亂象的反映。本文不認為如此。在分析該爭議的兩大要角——農林處長徐慶鐘與林產管理局長唐振緒——的背景、學術傳承與經營理念後，本文認為，該爭議的引爆點為20世紀上半葉生理生態學與工程學對於環境治理的不同理念。徐、唐兩人的差異，在國共內戰期間中華民國對臺灣木材的高昂需求下，不停加深加廣，將主持地方林政與林產機構、伐木業者、各縣市材商、聯合國救濟總署之林業顧問、中華民國之林業專家等一一捲入，讓原本只是單純的林業職權調整，釀成戰後初期臺灣最大的環境爭議，也是戰後臺灣環境史上的首次爭議。

關鍵詞：環境史、林業、環境爭議、森林經營

The Controversy over Reconstruct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aiwan after the February 28th Incident: The Case of Forestry

Kuang-Chi Hung* Chia-Hsien Chang**

Abstract

What were the economic, social, 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facing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 Taiwan in the wake of the February 28th Incident in 1947? This question has been well addressed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but similar studie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main lack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is topic by focusing on a major bureaucratic clash in postwar Taiwan's forestry - the “wavering between integration and separation of forest administration and forest product management” - and discusses its political,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and forest product management are two components in the forestry system. The former encompasses conservation, afforestation, and disposal of forest products, i.e. leasing logging rights to private companies after evaluating the price of timber on state-owned compartments, and the latter focuses on the governance of coniferous tree farms like Alishan, Baxianshan and Taipingshan, which operate just like logging companies and earn profits by harvesting and selling timber. Existing literature often treats the controversy around the government's wavering between integration and separation of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and forest product management as either a conflict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r a reflection of the political limbo during the chaotic transition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after the February 28th Incident. This paper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Maste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isagrees with those interpretations. At the center of the controversy were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Xu Qingzhong and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Forest Product Management Tang Zhenxu. After examining the personal backgrounds, academic lineages, and management philosophies of Xu and Tang, this paper contends that what ignited the controversy was the divergent idea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formed by physiological ecology (Xu) and by engineering (Tang)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the demand for timber skyrocketed during the Chinese Civil Wa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Xu and Tang continued to grow and eventually engulfed local offices in charge of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and forest product management, logging companies, forestry advisor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authoritative experts of forestr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at began as a simple adjustment in the division of work in the forestry system in the end led to the biggest, and arguable the first, environmental debate in postwar Taiwan.

Keywords: environmental history, forestry, environmental controversy, forest management

國史館館刊 第 76 期

林政與林產分合不定：戰後初期臺灣 環境秩序的重整與爭議^{*}

洪廣冀^{**} 張嘉顯^{***}

壹、前言

1947年5月，專業為外交、時為立法院副院長的魏道明就任首任臺灣省主席。面對二二八事件後人心思變、「臺人治臺」呼聲高漲的臺灣人民，在規劃省政府之組織與人事時，他自得小心翼翼。讓他格外花心思的是正當性搖搖欲墜的林業部門。二二八事件時，林務局轄下分駐各地的工作站與各大林場皆遭遇民眾湧入燒打、盜伐與濫墾的危機，事件不只讓當時的林業行政體系暫時停擺，也讓事件後於3月舉行的植樹節慶祝活動瀰漫著低落士氣。¹ 二二八事件的「動亂」不只造成林業行政與產業經營更加混亂，也衝擊戰後臺灣一元化林業體制的政策方針與正當性。不論是事件中發生的燒打、盜伐與濫墾，抑或是事後開始有原住民紛紛出面要求林務局所屬林場應歸還殖民時代強占土地等事實，在在顯示由林務局這個省級三級機構一元化管理占臺灣島55%面積的森林的現況，已受到臺灣民

^{*} 本文曾發表於2023年10月22日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主辦之「終戰、接收、二二八」學術研討會。

收稿日期：2022年12月21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5月3日。

^{**}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暨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暨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

¹ 姚鶴年，《臺灣省林務局誌》（臺北：臺灣省農林廳林務局，1997年），頁120。

眾公然挑戰與質疑。² 二二八事件後關於林業政策與體制的爭議至此正式浮上檯面，魏道明如何處理林業問題，成了首任省主席必然面對的課題之一。

關於林業問題，魏道明主張林政與林產部門分離。戰後一元化的林業體制指的是戰後成立的林務局同時負責林政與林產業務，而林政與林產為林業術語：林政負責保林、造林與林產處分（查定國有林班地上之林木價格後，售賣給業者伐採，收取「木代金」，業者得自行設法將林木搬出至市場上，售出獲利），林產則經營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鹿場大山、香杉山等原由日本林業會社經營的針葉林場，如同一般伐木公司一般，靠伐木與木材銷售獲利。³ 在行政長官公署時期，出於「以林養林」——即以林產的收益挹注保林與造林——的構想，林政與林產皆由農林處林務局管轄。即便該局為農林處下的三級機關，但因農林處本身並無林業部門，林務局可說是臺灣林業的最高主管機關。魏道明不認同此制度設計。他認為，暫且不論因為手握林政與林產兩大權於一身造成林務局人事組織過於龐大，更糟的是「球員兼裁判」；理應以長遠視角做規劃、讓林業可生生不息，並且監管森林產業的林政部門，卻捨本逐末地為林產部門大開方便之門，讓臺灣森林陷入濫伐之窘境。⁴

魏道明決定將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拆成林政與林產兩部分，由不同人接收，且歸省府不同部門管轄。在林產方面，他屬意出身江蘇無錫的康乃爾大學水利

² 關於二二八前後的臺灣林業，見洪廣冀、張嘉顯，〈「林務局之惡聲狼籍，布於全島」：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臺灣林業〉，《臺灣史研究》，第30卷第1期（2023年3月），頁137-185。

³ 林政與林產的分類係繼承殖民林業體制而來；關於此分類的起源與戰後初期的演變，見洪廣冀，〈林學、資本主義與邊區統治：日治時期林野調查與整理事業的再思考〉，《臺灣史研究》，第11卷第2期（2004年12月），頁77-144；洪廣冀，〈戰後初期之臺灣國有林經營問題：以國有林伐採制度為個案（1945-1956）〉，《臺灣史研究》，第9卷第1期（2002年6月），頁55-105；關於戰後臺灣林政，見陳純瑩，〈戰後臺灣森林警察之設置與功能（1946-1958）〉，《東吳歷史學報》，第9期（2003年3月），頁219-264。何鳳嬌，〈戰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事業地的接收與經營〉，《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6期（2008年6月），頁223-258。

⁴ 關於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的大一統邏輯，見洪廣冀、張家綸，〈「建設新臺灣」：黃維炎與戰後臺灣的林業接收〉，《臺灣史研究》，第29卷第3期（2022年9月），頁149-199。關鍵史料為林務局的業務報告：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臺灣林業概況（民國三十五年度）〉，《臺林》，第1期（1947年4月），頁104-137。

工程學博士唐振緒；至於林政，他則打算交給臺北帝國大學首位農學博士、土生土長的萬華人徐慶鐘。⁵相較於魏道明於任內推動的諸多改革，前述「農林處——林政」與「林產管理局——林產」的設計並不尋常。關心戰後臺灣政治史的研究者已告訴我們，號稱將擴大臺灣人之政治參與的魏道明，在真正推動時，如不是因為蔣中正與美國的介入而口惠而實不至，便是因派系傾軋而委曲求全；到最後，真正能在省府中擔任要角者，如非外省人便是所謂「半山」，臺灣人能參與政治者，數目與程度均相當有限。⁶然而，如果說前述研究揭露了魏道明在打造省府體制時的「通則」，其推動的林政與林產分治，且由臺北人徐慶鐘掌管林政，江蘇無錫人唐振緒負責林產，可說是特例。理由在於，自日治時期以來，雖說臺灣林業以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等林場的林產經營聞名，但在戰後初期，這些林場只占臺灣國有林面積的5.7%左右。換言之，其餘面積更為廣闊、樹種更為歧異、可產生之利潤更為多元與豐厚、跟地方社會的關係更為密切的國有林，均歸林政部門所轄。⁷魏道明將此重責大任託付給一位本土菁英，展現自身「臺人治臺」之執政理念。

歷史的開展總是難以逆料。魏道明為臺灣農林業做的布局未導向皆大歡喜的結局，反倒開啟臺灣林業史中惡名昭彰的「林政與林產分合不定」時代。至1952年，《公論報》社論還在指陳，「本省在光復之初，因青黃不接，農林廳與林產管

⁵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命令類〉，《林產通訊》，第1卷第1期（1947年9月），頁3。關於魏道明招募唐振緒的經過，見丁國平，《唐振緒》（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1996年），頁64；徐慶鐘則可參考陳許碧梧口述，許雪姬訪問，〈陳許碧梧女士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5期（1994年2月），頁261。

⁶ 關於魏道明主持下的臺灣省政，重要研究包括鄭梓，《戰後臺灣的接收與重建：臺灣現代史研究論集》（臺北：新化圖書公司，1994年），頁237-259；湯熙勇，〈戰後初期臺灣省政府的成立及人事佈局〉，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1997年），頁125-150；陳翠蓮，〈二二八事件後的臺灣省政府人事〉，《法政學報》，第8期（1997年8月），頁33-62；松田康博著，黃偉修譯，《臺灣一黨獨裁體制的建立》（臺北：政大出版社，2019年），頁198-199；值得一提者為夏良業，〈魏道明與臺灣省政改革（1947-1948）〉（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⁷ 5.7%的估算出自林產管理局針對聯合國救濟總署顧問藍高梓之視察報告的修正，見藍高梓，〈臺灣之林業及森林資源〉，《林產通訊》，第1卷第4期（1947年10月），頁5。

理局一度且曾因林政職權問題，糾纏不休，搞得林政廢弛，森林遭盜伐及無計劃濫伐，損失甚重」。⁸ 林產管理局與農林處之間究竟發生什麼事？「林政與林產分合不定」之具體內容為何？在目前極少數針對戰後初期臺灣林業的研究中，即便研究者必然提及林政與林產分合不定，但如不是視之為政權轉移、青黃不接時必然的徵候，便是類比為當代社會中保育與開發的對立。換言之，研究者至今還未能設身處地地理解該爭議的前因後果，遑論彰顯該爭議之於戰後臺灣環境史的意義。

我們希望嘗試透過政府機關檔案、林業期刊、報章雜誌、口述歷史等史料，勾勒出戰後初期臺灣林政與林產分合不定的始末，藉此與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官僚研究（bureaucracy studies）展開對話。人文社會學界對於官僚的關注由來已久。20世紀初的社會學者Max Weber將官僚視為理性的表現，同時也預言官僚將把逐步理性化、除魅的社會關入鐵牢（iron cage）。曾在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扮演要角的人類學者David Graeber則認為，當去管制、仰賴市場看不見之手來運作的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人類社會正經歷史無前例的「全面官僚化」（total bureaucratization）。然而，如人類學者Tess Lea在一篇回顧論文中點出的，雖說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反覆強調官僚在理解社會如何運作、底層如何遭到噤聲與為何挺身抵抗的重要性，事實上是，除了政治學、公共行政、社會組織學研究者外，少有研究者認真看待官僚。她的意思是，在研究者的筆下，官僚如不是被當成背景，就是國家機器中的螺絲釘；相較於研究者在揭露農民、工人、原住民等底層或邊緣行動者之能動性的努力，同樣也是有血有肉、有著慾望、理念、野心與失落的官僚，真的如同螺絲釘般地不值一哂。⁹

該如何讓官僚能如同人一般地現身、而不是可被拋棄、替換、不具任何人格、意志、能動性與主體性的螺絲釘？在官僚研究中，廣受討論者為Pierre Bourdieu的官僚場域（bureaucratic field）。作為化解結構與能動性之張力的社會學大師，Bourdieu主張官僚為如同藝術、學術般的場域，當中有各種力道，為

⁸ 該社論收入沈克夫（Paul Zehngraft）著，康瀚譯，《臺灣之林業情形》（臺北：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1953年），頁51。

⁹ Tess Lea, “Desiring Bureaucrac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50 (October 2021), pp. 59-74.

了公共財的定義與分配展開爭奪（*vying*），且在過程中既再製（*reproduce*）既有結構，同時又埋下結構變遷的種子。他期許研究者細究不同政府部門擬定與推動政策時的理論與實作，注重其間差異，從而揭露「公共」的意義既非鐵板一塊，也無法定於一尊，而是在服務於不同部門的技術官僚中的協商與鬥爭中成型。¹⁰ 對環境史研究而言，Bourdieu的觀點頗具啟發。考慮到國家在環境治理上的重要性，環境史研究很難不處理到官僚。然而，傳統見解如不是主張國家為資本主義的助產婦，便是認為國家推出的政策為某種放諸四海皆準之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反映。Bourdieu的觀點毋寧是提醒研究者，若國家在環境治理上真如此重要，研究者就不能將國家視為內建能動性、具有獨立意志且能自在行動的行動者，而是得視國家為場域，細究深陷其中的行動者，如何理解、詮釋與落實環境的「公益功能」。¹¹

臺灣史研究者對於「官僚」一詞當不會陌生。首先，從1980年代至今，為了回答臺灣為何能擺脫中南美國家依賴發展的窘境，大量研究者投身探討技術官僚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中的角色。¹² 再者，隨著環境保護與保育已為當代社會的核心價值，研究者也指出，如此以技術官僚為核心、以經濟為依歸的發展策略係以

¹⁰ 有關援用Bourdieu場域理論分析官僚體系的研究，請詳參：Loïc Wacquant, “Crafting the Neoliberal State: Workfare, Prisonfare, and Social Insecurity,” *Sociological Forum*, 25:2 (June 2010), pp. 197-220; Pierre Bourdieu, Loïc Wacquant, and Samar Farage, “Rethinking the Sta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Bureaucratic Field,” *Sociological Theory*, 12:1 (March 1994), pp. 1-18; Ioanna P. Korfiati, “Classifying Like a State: Land Dispossession on Eastern Crete’s Contested Mountains,” *Antipode*, 52:5 (September 2020), pp. 1331-1350; Davina Cooper, “Prefiguring the State,” *Antipode*, 49:2 (March 2017), pp. 335-356.

¹¹ Laura Bear and Nayanika Mathur, “Introduction: Remaking the Public Good,” *The Cambridge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33:1 (March 2015), pp. 18-34.

¹² 戰後臺灣之技術官僚的研究成果甚豐，舉其著者：林蘭芳，〈戰後初期資源委員會對台電之接收（1945-1952）——以技術與人才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9期（2013年3月），頁87-135；瞿宛文，〈臺灣經濟奇蹟的中國背景：超克分斷體制經濟史的盲點〉，《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4期（2009年6月），頁49-93；瞿宛文，〈民主化與經濟發展：臺灣發展型國家的不成功轉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4期（2011年9月），頁243-288；張國暉，〈國族渴望的巨靈：臺灣科技官僚治理的中國脈絡〉，《國家發展研究》，第12卷第2期（2013年6月），頁73-132。

環境破壞為代價。¹³ 雖說官僚研究為戰後臺灣史最為豐碩的成果之一，仍有下列問題值得深究：一、研究焦點多集中在李國鼎、尹仲容等位居高位的中華民國科技官僚；如徐慶鐘、唐振緒等於省政府任職的二三級官僚，乃至於負責執行政策的基層官僚，相關研究幾近於零。二、研究時段多從1950年代的美援為起點；關於1945年至1949年間，即臺灣的治理者從臺灣總督府經行政長官公署至臺灣省政府的轉折，目前研究仍相當有限。三、即便有少數研究確實論及前述轉折，但焦點多在制度與人事；至於那些基於各種理由於草創初期之省府中服務的技術官僚，他們到底是誰？其背景為何？他們在各層級的行政會議中談了什麼？在公文邊緣做了什麼批示？在瞬息萬變、動輒得咎的官場，他們又做出什麼回應？這些細節毋寧是理解戰後初期之臺灣政局與社會的鑰匙。當成立初期之省府的整體架構已在幾位先行者的努力下逐漸明晰，該是研究者接棒、釐清此整體架構中的微觀政治的時候了。

本文準備讓參與林政與林產分合不定之爭議的行動者一一現身。在結構上，本文聚焦在林政與林產分合的兩大轉折點：一是1947年9月，徐慶鐘於農林處下增設林務科，並令唐振緒將林政、林產與經理三組交給該科掌管；二是1948年6月，唐振緒重新將林政等三組收入林產管理局麾下，農林處林務科則遭撤銷。以下首先介紹徐慶鐘出場。本文將追溯這位為省主席魏道明重用之臺籍菁英的學思歷程，從而理解其對林業的看法，以及為農林處林務課所做的布局。採同樣方式，本文也檢視唐振緒及其一手打造的林產管理局。在介紹林政與林產兩部門的兩位要角出場、且釐清兩造的路線差異後，本文將追溯林政與林產之爭從無到有、從部門間的齟齬至野火燎原的過程。我們將看到，在國共內戰期間，中華民國對臺灣木材的高昂需求下，林政與林產之爭不停加深加廣，將各級官僚、聯合國救濟總署之林業顧問、中華民國之林業權威等一一捲入。至1948年春，原本單

¹³ 關於戰後臺灣環境史，代表成果見：曾華壁，〈臺灣的環境治理（1950-2000）：基於生態現代化與生態國家理論的分析〉，《臺灣史研究》，第15卷第4期（2008年12月），頁121-148；黃信勳，徐世榮，〈戰後臺灣的環境治理進路：一個生態現代化視角的考察〉，《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第52卷第4期（2014年12月），頁5-63。就林業史而言，陳勇志的專書為主要研究成果：陳勇志，〈美援與臺灣之森林保育（1950-1965）——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關係之個案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0年）。

純的林業職權調整，竟惡化為戰後初期臺灣最大的環境爭議，甚至也可能是戰後臺灣環境史上首次的環境爭議。

貳、一名生理生態學者的養成

1928年，出身艋舺的客家人徐慶鐘進入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就讀，師從磯永吉教授。據徐慶鐘回憶，當時的磯永吉成功在臺栽培出吻合日本社會口味的稻米，即所謂「蓬萊米」，這意味著殖民農業開始迎接「新興作物之研究」的時代。¹⁴ 讓徐慶鐘感興趣的新興作物為黃麻。黃麻為主要的纖維作物，但種子得從印度進口。為求纖維原料的自給自足，黃麻種子的品質至關重要。判斷種子品質的判準之一為硬實率，即種子因種皮過於堅硬、導致發芽不良的比率。徐慶鐘發現，播在田間的黃麻種子不會因硬實而導致發芽不良，但在實驗室內進行發芽試驗時，卻會出現硬實；不僅如此，隨著貯存方式的不同，黃麻種子也會有著不同的硬實率。此現象引發徐慶鐘的研究興趣。他廣泛參考歐美關於種子硬實的學說，並在實驗室中設置實驗組與對照組，以釐清誘導黃麻結出硬實或正常種子轉為硬實的機制。最後，徐慶鐘不僅證實黃麻硬實的生成與人為環境較有關係，甚至提出實用建議，即栽植者該如何設計黃麻種子的貯存環境，適度將部分種子轉為硬實，以延長種子的保存期限，需要時再催芽即可。徐慶鐘的初試啼聲之作兼具科學與實用性；他不僅獲邀在日本農學大會上發表其成果，論文更刊登在1934年的《臺灣農事報》上。¹⁵

自臺北帝大畢業後，徐慶鐘被任命為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農業部研究員，擔任油料與纖維作物系主任，並兼任臺大理農學部助教，協助教授、副教授之教

¹⁴ 徐慶鐘，〈前言〉，收入「科學行政在臺灣」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徐慶鐘博士論文集：科學行政在臺灣第一輯：作物生理生態學研究及應用》（臺北：「科學行政在臺灣」論文集編輯委員會，1977年），頁7-9。關於磯永吉的農業研究，見歐素瑛，《臺北帝國大學與近代臺灣學術的奠定》（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20年），第四章。

¹⁵ 徐慶鐘，〈黃麻硬實種子之研究〉，收入「科學行政在臺灣」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徐慶鐘博士論文集：科學行政在臺灣第一輯：作物生理生態學研究及應用》，頁3-36。

學及研究。在此時點，徐慶鐘接到磯永吉的指示，要他協助解決總督府在推廣黃麻栽植時遭遇的大問題。原來，1930年代，蓬萊米大量輸日，日本稻作豐收，臺灣總督府決定減少稻作面積，並認為以黃麻代作，最為恰當，遂從印度大量進口黃麻種子推廣栽培。不過政府發現黃麻播種後不久，種子便開花分枝，不適於採取纖維，這讓總督府的黃麻代作計畫，面臨破局的危機。為瞭解影響黃麻生殖期的機制，徐慶鐘先在溫室內試驗黃麻生殖期與土壤水分的關係，發現兩造關係不大。於是他注意到美國農學界正熱烈討論的作物光週期（photoperiodism）學說。該學說認為，日照時間與植物生殖期關係密切，且可依照「作物需要多少日照時間以進入生殖期」將作物分為長日時與短日時植物。受此啟發，徐慶鐘以一系列實驗證明，讓黃麻提早在臺灣開花的環境因子為日照時間，並進一步提出「生殖期之長短，並不按日照時間長短成比例」，且「在某範圍內之日照時間內不影響生殖期之遲早，在某一臨界時間外才反應生殖之遲早」，為光週期說做出貢獻。¹⁶

徐慶鐘也發現光週期學說之於臺灣農業的意義。原來，總督府農業部門在進口種子時，雖會注意到種子的「品種」，然對於單一品種下的「系統」，無力也無法顧及。徐慶鐘認為，依據生殖期與日照時間的關聯，農業經營者可純化單一品種下的「系統」；只要種子的系統越純，其生殖期便會趨於一致，經營者便可更精細地安排各作物播種與收成的時程，讓土地利用趨於多元，也更有效率。拜徐慶鐘的發現之賜，原本以為無法在臺灣大量栽培的作物，像是亞麻、小麥、玉蜀黍等，都因系統純化之法，加入臺灣的新興作物之列。¹⁷

從科學史的角度，徐慶鐘從事的是生理生態學（physiological ecology）的研究。生理學為19世紀中葉以降急遽發展的學科，強調在實驗室此人為調控的環境

¹⁶ 徐慶鐘，〈前言〉，頁7-9；徐慶鐘，〈黃麻播種期與生長變異之關係〉，收入「科學行政在臺灣」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徐慶鐘博士論文集：科學行政在臺灣第一輯：作物生理生態學研究及應用》，頁127-152。

¹⁷ 徐慶鐘，〈前言〉，頁7-9；亦見徐慶鐘，〈臺灣稻的季節特性和日照時間與溫度間的關係〉，收入「科學行政在臺灣」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徐慶鐘博士論文集：科學行政在臺灣第一輯：作物生理生態學研究及應用》，頁37-70。

下，探究生命的機制，而不僅仰賴博物學式的搜集、觀察與比較之法。生態學則在19世紀末期興起，認為可在森林、湖泊、草原中設置實驗站，配置必要的人員與儀器，如同在實驗室一般地探究環境因子係如何影響生物群落（community）的分布、構成與演變。¹⁸ 生理生態學兼採兩者之長，同時在實驗室與實驗站中探討環境因子與生命間的交互關係。傳統分類學也受此影響。在傳統博物學式的方法論外，20世紀上半葉的分類學者強調以個體的生理反應來做為分類的判準。¹⁹ 徐慶鐘可說是前述思潮的繼承者與實踐者。並且，做為極為少數能進入帝國學術體系的臺灣人，他也藉此重新了解與臺灣這塊土地。在總督府以帝國為中心的考量下，臺灣的特異性為何？此特異性該如何測量與定義？顯然的，若不考慮此特異性，貿然引入新作物或新技術，非但不能增進臺灣社會的福祉，反倒會釀成災難。這些思考將會構成其博士論文〈臺灣農作物栽培季節之特異性的研究〉的主旨。

以嚴謹之實驗室方法、做出兼具學術與政策意涵之研究的徐慶鐘，儼然成為帝國農學界的新星。1936年間，福建省政府以「閩臺自然環境相似」為由，擬以臺灣農業發展為借鏡。臺灣農業學術界又應福建省政府之邀，組織福建農業考察團，由5位專家組成，磯永吉為團長，而徐慶鐘為成員之一，年僅29歲。1941年9

¹⁸ 關於19世紀末生理學與傳統博物學的交鋒，見Soraya De Chadarevian, "Laboratory Science versus Country-House Experiments: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Julius Sachs and Charles Darwin,"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9: 1 (March 1996), pp. 17-41; 關於生態學知識的「生產地」，見Sharon Kingsland, "The Role of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Ecology," in Ian Billick and Mary V. Price, eds., *The Ecology of Place: Contributions of Place-Based Research to Ecological Understand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 15-39.

¹⁹ 關於生理生態學兼具實驗與田野之方法論的特色，見Vanessa Heggie, "Higher and Colder: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Boundaries in High Altitude and Antarctic Research Station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6: 6 (December 2016), pp. 809-832; Bruno J. Strasser, "Laboratories, Museums, and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lan A. Boyden's Quest for Objectivity in Serological Taxonomy, 1924-1962,"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40: 2 (Spring 2010), pp. 149-182. 徐慶鐘並非唯一將此概念應用在農業上的學者。在臺北帝大的教師陣容中，另一採此取向並做出卓越貢獻者為松本巍，見謝明如，〈臺灣植物病理學的第一人——松本巍與臺灣植物病理學之建立〉，《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第66卷第3期（2013年9月），頁31-56。

月，他向臺北帝大提出學位論文，於1945年10月通過臺北帝大農學部教授會的考試，取得農學博士學位。1945年12月，臺灣大學成立後，校長羅宗洛聘徐慶鐘為農學院教授，為校內唯一臺灣出身的教授級師資。²⁰

徐慶鐘的影響力很快就擴及校園外。1946年8月起，他開始在工商界展露頭角，先後擔任臺灣土地銀行董事、臺灣肥料運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他也開始涉足政界；先應行政長官陳儀之邀，出任行政長官公署參議兼土地委員會專門委員。²¹ 1947年5月底，當二二八事件餘波蕩漾，臺灣社會莫不期盼省主席魏道明能開創新局時，魏主席探問徐慶鐘出掌農林處長的意願。儘管這位農學博士並不排斥學而優則仕，但出任臺灣省最高農林首長，還是超乎他的想像。1947年6月，當魏道明正式發布任命後，其在臺北高校與臺北帝大（法政學部法學科，1932年畢業）的學弟、曾在滿洲國擔任文教局局長的陳錫卿，前往徐慶鐘的研究室道賀。徐慶鐘跟他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被叫去當農林處長，又沒有經驗，不知如何是好？」²² 是年，他方才40歲。

即便出任農林處長可能不在徐慶鐘的規劃之內，但他似乎想要把握此難得的機會，發揮所長。在其為《臺灣農林月刊》所撰的創刊詞中，他寫道，身為臺灣最高的農林首長，他會承魏主席「在安定中求繁榮」之昭示，「銳意整飭機構，延納賢能，集思廣益，傾注全力於臺灣新農林事業之建設」。²³ 至於要如何達成，從後見之明來看，徐慶鐘的切入點為十餘年學術研究的結論：臺灣社會與環境的「特異性」。

²⁰ 徐慶鐘先生周甲紀念籌備會，〈徐慶鐘先生事略〉，收入徐慶鐘先生周甲紀念籌備會編，《徐慶鐘先生周甲紀念論文集》（臺北：徐慶鐘先生周甲紀念籌備會，1967年），1-4；關於戰後初期的臺灣大學，見歐素琰，《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臺灣書房，2012年），特別是第二章「新大學的誕生」；徐慶鐘出現在該書第5、15、17、19、25、37、83、85、89等頁。

²¹ 徐慶鐘先生周甲紀念籌備會，〈徐慶鐘先生事略〉，頁1-4。徐慶鐘的履歷見「送徐慶鐘等二員資歷證件電請核轉銓審由」（1948年12月7日），〈農林處人員任用甄審〉，《臺灣省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檔管局）藏，檔號：A375000000A/0037/0033.1/0005/0006/001。

²² 陳許碧梧口述，許雪姬訪問，〈陳許碧梧女士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5期（1994年2月），頁261。

²³ 徐慶鐘，〈告農政工作者與農民：代創刊詞〉，《臺灣農林月刊》，第1期（1947年9月），頁2-3。

叁、林政一元化

按照魏道明的規劃，徐慶鐘得在農林處中設置林務科，以承接前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中的林政、林產與經理三組，以及前林務局部署於臺北、新竹、臺中、埔里、臺南、嘉義、高雄、宜蘭、花蓮港、臺東的10處山林管理所；所餘部分，主要是負責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等針葉林場之經營管理的林產管理委員會，則由康乃爾大學水利工程學博士唐振緒接收。不過，可能是出自唐振緒的建議，魏道明體會到，臺灣林業的改革已到刻不容緩的地步，若再因接收而有所延宕，後果不堪設想。6月2日，他即發布訓令，「計所有林務局暨所屬各機構，著由該局長負責全部接收，俟農林處及所屬各機構組織確定後，再行調整」。²⁴

對於魏主席的改革，徐慶鐘的態度為何？從其日後出版的《改進臺灣林業的研究》中，我們可找到一些線索。首先須釐清者為徐慶鐘對殖民林業的評價。徐慶鐘認為，殖民政府的林業部門，充分體會臺灣山高水急的特異性，先將臺灣九成以上的森林收歸官有，再採「科學方法」經營之。例如，他表示，殖民林業部門將大面積的森林劃入保安林，以發揮森林涵養水源、水土保持的功能，同時也針對那些可供木材生產的森林，在做出詳盡之面積、蓄積與生長量的調查後，編製經營計畫（日文為「施業案」），追求木材的永續生產。特別在阿里山、八仙山與太平山等飽含珍貴之針葉林資源的林場，他也讚賞，殖民政府不惜投入鉅資，興建大規模的基礎設施，足見其長期經營的視野與打算。不僅如此，他也觀察到，為了撐起此高度專業化的知識與技術體系，殖民政府也設置林業教育與試驗機構，培養臺灣本土的林業人才。至於在林業行政方面，徐慶鐘也認為殖民林業頗有借鏡之處。他認為，即便殖民林業的主管機關更迭頻繁，但萬變不離其宗，即「行政與業務莫不截然劃分」，「因兩者性質不同，互為牽制，輒引起人事糾紛，以致未能發揮其應有的機能，蓋其為一管理之機能，一為被管理之機能，若兩者混而為一，則易發生弊端」。總之，徐慶鐘認為，殖民政府為臺灣林業打下

²⁴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命令類〉，《林產通訊》，第1卷第1期（1947年9月），頁3。

良好的基礎；相較於經營技術落後、「利用甚未發達」的中華民國林業，只要省府能在殖民林業的基礎上持續精進，「臺灣林業足為將來大陸建設的表率」。²⁵

但徐慶鐘也不認為得對殖民林業照單全收。他批評，在眾多讓人讚嘆與欽佩的制度背後，殖民林業要滿足的還是母國的利益。他舉例，殖民政府「不准本省人民在國有林野經營林業，其經濟經營則依其殖民地政策專由政府及少數資本家經營」；「臺灣出產世界上貴重樹種——檜木——伐採甚能獲利，因此日人特設官營林場大量輸出於日本」；戰爭期間，為了滿足母國高漲的木材需要，政府竟任由特定幾家會社大肆砍伐等。更讓人痛心者，徐慶鐘指出，殖民林業的主要繼承者，即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林務局，不僅未將林業導入正軌，反倒以「緣故關係」為由，讓那些曾為殖民會社工作、堪稱為虎作倀的臺籍業者，就地合法，「致林業經營失去重心」。²⁶

該如何亡羊補牢？徐慶鐘認為關鍵有二：首先，在經營方針方面，他認為，「臺灣的林業自應按照國策，為全民利益，將過去日人殖民地政策，改為三民主義的林業政策」。他宣布，「今後臺灣林業，應由政府與人民合作，作有計劃的建設性的科學經營。例如造林事業，除政府自行造林外，尤應獎勵人民擴大造林，即以國有林地租地造林辦法，發展民營林業」。所謂租地造林，即是將需要造林的國有林地租予民眾造林。徐慶鐘認為，「以林地國有，林業民營的方式，在政府與人民契約下，政府尚能控制其造林樹種及砍伐時期等，即可由政府實施整個的森林施業方案」。相較於他國林業，多是政府鼓勵地主在其土地上造林，徐慶鐘認為，「由於本省國有林占總森林面積的90%以上之多，故我們所創立的此種辦法，將來成為國際上森林經營的一特色」。²⁷

亡羊補牢的另一關鍵為全面改革臺灣的林業體制。回到前述徐慶鐘對殖民林業的評價。徐慶鐘的看法是，殖民政府追求林政與林產之分治是對的，但問題

²⁵ 徐慶鐘，《改進臺灣林業的研究》（臺北：中央委員會設計考核委員會，1956年），頁1-4。

²⁶ 徐慶鐘，《改進臺灣林業的研究》，頁1-2、4-5、10、20；曾昭鉅，〈談林產處分上之「緣故關係」〉，《林產通訊》，第9卷第2期（1950年5月），頁6-7。

²⁷ 徐慶鐘，《改進臺灣林業的研究》，頁2、7-8、20-21。

就出在，殖民政府一直未能建立強而有力的林政部門，並由該部門來統御林產，才會在殖民母國對臺灣木材的需求激增之際，釀成臺灣森林濫伐之慘禍。至於戰後接收殖民林業的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從徐慶鐘的角度，不僅未能從殖民林業中汲取教訓，反倒走到另一極端，即將林政與林產冶為一爐，此設計讓林政更無法制衡林產，導致濫伐變本加厲——在兩造分治的狀況下，林政都無法駕馭林產了，更何況共存於同一組織體內？那麼，什麼才是最為理想的林業體系？徐慶鐘認為，「行政與企業應行分開，同時行政應管理企業，故一切林業行政，則應力求一元化」；更具體地說，在官僚體系中，林產部門應位於比林政部門還低階的位置；林政部門從事規劃與擬定方針，令林產部門從事伐木與造林；若以人體比喻，林政部門便相當於大腦，林產部門為四肢；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林業，容易顧此失彼，導致「森林經營失了重心」。²⁸由此看來，1947年夏天的徐慶鐘，想必欣慰魏道明屬意農林處為臺灣林業的大腦，而林產管理局為受其支配的四肢。

1947年6月以降，徐慶鐘的重心逐漸從臺灣大學的實驗室移至位於前臺北州立臺北第二高等女學校校舍的農林處辦公室。²⁹這時的徐慶鐘，應當體會到，象牙塔外的世界，遠比其想像的來得詭譎複雜。隨著魏道明人事布局的明晰，臺灣人民逐漸認清，即便「臺人治臺」的呼聲高漲，真正能在省府擔任要職的臺灣人，還是鳳毛麟角。可能是出自四面楚歌的危機感，徐慶鐘在規劃農林處的人事時，大量晉用如他一般出身臺北高校與臺北帝大的臺灣人。³⁰他先邀請具政治長才與行政經驗的陳錫卿擔任機要秘書；再致電其臺北高校的學弟楊基銓，要他至辦公室一敘。³¹在楊基銓的回憶錄中，兩人會面時的場景如下：

²⁸ 徐慶鐘，《改進臺灣林業的研究》，頁6-7。

²⁹ 農林處位置係根據楊基銓撰述，林忠勝校閱，《楊基銓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頁199。

³⁰ 曾在徐慶鐘草創農林處時期擔任林產科長的楊基銓回憶：「我擔任水產科長時，農林廳的科室主管，陸續更換，大半都由台北高校同學擔任」。他也回憶，「農林廳的副廳長陳世燦及主任秘書閔榮興，雖然來自大陸，但均留日」。見楊基銓撰述，林忠勝校閱，《楊基銓回憶錄》，頁207。關於臺北高校在臺灣菁英養成上扮演的角色，見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

³¹ 關於陳錫卿進入農林處的經過，見陳許碧梧口述，許雪姬訪問，〈陳許碧梧女士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5期（1994年2月），頁261。

他〔按：徐慶鐘〕希望我進入農林廳〔按：應為農林處〕協助他，擔任水產科長。他說，我在日治時期曾經做過台北州商工水產課長，所以，我是水產科長的適當人選。其實，我在台北州時，商工水產課已改為商工課，水產已劃出去，不再屬商工課，我是商工課長，所以我對水產行政是沒有經驗。不過，當時我覺得在台北市政府服務沒有前途，農林廳〔按：處〕可能更適合我，工作也比較有意義，因之，我表示接受他的提議。³²

在林務科部分，徐慶鐘選擇了胡煥奇。胡煥奇生於1906年，為臺中州員林郡永靖庄人（今彰化縣永靖鄉），1929年入臺北帝國大學政學科，畢業論文題目為〈孫文學說研究〉。可能是殖民地臺灣未能提供胡煥奇大展身手的機會，他決定離臺發展，先後擔任哈爾濱學院教授、上海華聯通訊社總編輯、上海律師公會會員、西北農業專科學校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長春稅務監督署科長等職。³³乍看之下，胡煥奇的事業係隨著日本帝國而擴張；但依據1935年1月9日上海總領事石射猪太郎向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的報告，當時擔任上海華聯通訊社總編輯的胡煥奇，與臺灣的左翼分子謝春木過從甚密。石射猪太郎指出，該社「與各報社、團體、中國籍要人等聯絡，另一方面，透過被注意臺灣人，以蒐集情報。再者，利用『收音機』將所獲得之時事問題及其他等之排日記事以誇張手段揭示，每日發行謄寫版印刷品（約每月十圓左右），向中國新聞社及其他主要中國人頒布，提供排日資料」。石射猪太郎還陳述「謝春木之友人關係及其心境」：

根據中日現在之狀況，臺灣人倘若要活躍於中國實屬困難，結果在中國復籍，以純中國人而迴避日本，或是以純日本人之餌外無他途，目前在

³² 楊基銓撰述，林忠勝校閱，《楊基銓回憶錄》，頁199。

³³ 關於胡煥奇的生平，資料甚為零散；見王國瑞，《臺灣林業人物誌：第一輯》（臺北：王國瑞，1991年），頁112；〈胡煥奇〉，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2020/10/29點閱）；陳許碧梧口述，許雪姬訪問，〈陳許碧梧女士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5期（1994年2月），頁255；許雪姬，〈二戰前後在漢口的臺灣人〉，《臺灣史研究》，第26卷第1期（2019年3月），頁136；曾文亮、王泰升，〈被併吞的滋味：戰後初期臺灣在地法律人才的處境與遭遇〉，《臺灣史研究》，第14卷第2期（2007年6月），頁95-96；許雪姬著，羽田朝子、殷晴、杉本史子譯，《离散と回帰：「満洲国」の台湾人の記録》（東京：東方書店，2021年），頁185。

中國的臺灣同胞，是何等的迷惑，亦即又不可成為日本人，且又不被中國人所認同。³⁴

如謝春木、胡煥奇這樣的「臺灣同胞」，他們的「迷惑」恐怕隨著臺灣成為中華民國一省而加劇。二二八事件前後胡煥奇的動向不明。不過，依據陳許碧梧女士的口述，1947年5月底或6月間，胡煥奇隨著他在臺北帝大政學科的學弟陳錫卿前往臺灣大學農學院，向甫任農林處長的徐慶鐘道賀。以此為契機，在聘陳錫卿為機要秘書的同時，他也令胡煥奇執掌林務科（省府派令日期為6月27日）。³⁵10月底，在為胡煥奇爭取加薪時，徐慶鐘出面為其資歷背書：

查本處林務科科長胡煥奇確於民國21年在台北帝國大學畢業，曾任教授講師科長等職，共計12年又4個月，學識優良經驗豐富，據報資歷證件因在長春工作時國軍與共匪會戰所有證件全部遺失等情，核尚屬實，該員在長春稅務監督署科長任內最後支薪400元請特准給月薪400元，俾資羅致人才而利推行林務，合併陳明。³⁶

有著徐慶鐘的力挺，一位嚴格說來不具備任何林業經驗的臺北帝大畢業生，成為臺灣最高林政首長，負責臺灣九成以上的國有林；不僅如此，如依照徐慶鐘「林政一元化」的構想，林產管理局甚至也受胡煥奇指揮。

另一位為徐慶鐘重用者為潘迺賡。潘迺賡生於1908年2月18日，臺北士林人，為士林望族潘光楷之後。1931年從臺北帝大農林專門部林學科畢業後，留在帝國大學林政學教室進行林業政策研究。1934年至1942年之間歷任臺北州農會技手（負責山地開發與米糧改良）、臺陽拓殖株式會社的技師與臺中農場場長（一樣負責山地開發）。1942年至1947年之間擔任高砂農產株式會社支配人兼任臺北農場場長（1944年起再兼任大東殖產株式會社出張所所長）。1947年7月，即便

³⁴ 引自卞鳳奎，〈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臺灣人民抗日文宣組織——以上海、廈門為中心〉，《檔案季刊》，第12卷第1期（2013年3月），頁62-63，全文頁54-69。

³⁵ 「派胡煥奇暫代農林處林務科科長由」（1947年6月27日），〈農林處人員任免〉，《臺灣省政府》，檔管局藏，檔號：A375000000A/0036/0032.34/0029/0001/014；陳許碧梧口述，許雪姬訪問，〈陳許碧梧女士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5期（1994年2月），頁261。

³⁶ 「胡煥奇核薪通知書」（1947年11月6日），〈農林處人員任免〉，《臺灣省政府》，檔管局藏，檔號：A375000000A/0036/0032.34/0029/0010/010。

民間企業的待遇更為優厚，潘迺賡還是接受徐慶鐘的邀約，擔任農林處林務科技正兼經理組組長。³⁷

林產組組長李淦亦為臺籍，東京農業大學農科畢業；王國瑞之《臺灣林業人物誌：第一輯》稱其「對森林經理及林產業務均頗熟習」，其餘資料不詳。³⁸

有了3名臺灣本土人才的加盟，徐慶鐘認為，農林處林務科已經就緒。他令唐振緒擬妥改制後林產管理局的組織草案；以省府二級機關首長的身分，他表示該草案得由農林處審核通過才算數。對徐慶鐘而言，如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這樣龐大專政、不受農林處控制的龐大機構，就如同臺灣總督府一般，已為明日黃花。只要按部就班地推動臺灣林政一元化，他相信，臺灣林業遲早可以擺脫其殖民性格，在成為臺灣人之林業的同時，既為中華民國衰弱不振的林業做表率，同時可為國際林業的一大亮點。

肆、整體與多目標的臺灣林業

當徐慶鐘正在努力「整飭機構」與「延納賢能」時，新任林產管理局長唐振緒也在做同樣的事。出身江蘇無錫的他，受家族經營之義賑事業的啟發，很早便以治水為職志。1926年，唐振緒入唐山交通大學先修班就讀，於1935年取得該校學士學位。畢業後的唐振緒，先在黃河水利工程委員會工作一陣，於1936年8月赴美，於康乃爾大學攻讀水利工程學博士。當時美國水利工程界正熱烈討論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的意義。該局由小羅斯福總統於1933年下令成立，結合當時最先進的集水區與水文模型的理論，以整體規劃與多目標利用的視野，一舉將田納西河達105,073.2平方公里的集水區（drainage

³⁷ 「送潘迺賡等三員資歷證件電請核轉銓審由」（1948年12月10日），〈農林處人員任用甄審〉，《臺灣省政府》，檔管局藏，檔號：A375000000A/0037/0033.1/0005/0006/005；王國瑞，《臺灣林業人物誌：第一輯》，頁113。

³⁸ 「李淦核薪通知書」（1947年11月2日），〈農林處人員任免〉，《臺灣省政府》，檔管局藏，檔號：A375000000A/0036/0032.34/0029/0010/013；王國瑞，《臺灣林業人物誌：第一輯》，頁113。

area) 納入管控，在致力水力發電的同時，也兼顧造林、保林、水土保持、邊際土地之開發利用等事業。對年輕的唐振緒來說，當他以為治水就是防堵易生氾濫的河段，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的視野與手段讓他心生嚮往；在攻讀博士期間，他便前往該局實習，畢業後也帶著中華民國代表前往參訪。³⁹

畢業後的唐振緒並未立即返國。母國正深陷戰爭，他決定留在紐約，一方面在中華民國財政部籌設的世界貿易公司（Universal Trading Corporation）中任職，負責國防物資的採購；另一方面，有感於戰後的中國一定亟需工程人才，他籌辦刊物、組織學會與舉辦會議，扮演中美工程學界的橋樑。1945年11月，唐振緒返國，於資源委員會（位於重慶）任職。重新踏上這闊別9年又2個月的土地，他援引所學，特別是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揭櫫的整體與多目標視野，協助政府治理黃河與錢塘江。然而，正從戰火中復甦的中國，並未給予這名歸國學人大展鴻圖的機會。於是，在家族長輩（同時也為國民黨要員）邵力子的穿針引線下，唐振緒於二二八事件後來臺，於高雄港務局擔任副局長。省政府成立後，邵力子也向魏道明推薦唐振緒。曾任駐美大使的魏道明，與唐振緒算是舊識，也認為唐振緒值得更好的職位。他急電唐振緒前來臺北；見面後，二話不說，他要唐振緒接收前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的林產部門，藉此成立林產管理局，並擔任該局首任局長。⁴⁰

1947年6月16日，在老松國小禮堂舉行的林產管理局成立大會上，唐振緒向同仁強調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對他的啟

³⁹ 關於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的歷史、組織與規劃理念，權威著作見Herman C. Pritchett,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A Study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3); Selznick Philip, *TVA and the Grass Roots: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Formal Organiza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9); 田納西河集水區面積引自Pritchett,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p. 18. 關於唐振緒的成長背景與專業養成，及其在20世紀上半葉之水利工程學與水文學的地位，我們已另文處理詳見：洪廣冀、張嘉顯，〈「林務局之惡聲狼籍，布於全島」：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臺灣林業〉，《臺灣史研究》，第30卷第1期（2023年3月），頁137-185。關鍵史料見丁國平，〈唐振緒〉，頁1-37；禹，〈我們的唐局長〉，《林產通訊》，第2卷第6期（1948年3月），頁16-18。

⁴⁰ 關於取得學位後唐振緒於美國及戰後初期中國的活動，以及他來臺任職的契機，見丁國平，〈唐振緒〉，頁38-64；禹，〈我們的唐局長〉，《林產通訊》，第2卷第6期（1948年3月），頁16-18。

發，並宣布未來臺灣的林業方針為「保林重於造林，造林重於伐木」。⁴¹ 在一個名為「林產管理局」之機構的成立大會上表示該局方針為保林，唐振緒自有其用意。事實上，即便魏道明對他有知遇之恩，依據他的專業，唐振緒認為，臺灣林產管理要能成功，就如田納西河谷管理局要能提供充沛且便宜的電力一般，得以整體及多目標規劃的視野方能為功。魏道明將林政與林產分而治之的構想，對照當前以自然資源管理的趨勢，不免顯得守舊。回想起他回國後在推動黃河與錢塘江治水工程時的壯志難伸，這名38歲的留美工程師似乎認為，已有良好基礎的臺灣林業，恰提供一片當時中國恐怕絕無僅有的沃土，讓他可以試驗，來自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的思想種子，能否在中華民國的土地上生根。

以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為模板，在林產管理局成立的數月間，唐振緒致力改良該局體質，提昇整體專業度並增進工作效率。具體作法包括慰留前林務局中的專業人才、遣散冗員、招募新血、將原本散落三處的辦公室集中一處、籌辦《林產通訊》以為局內外的機關刊物、每月召開局務會議等。⁴² 唐振緒勵精圖治的作法贏得臺灣本土林業人才的支持。如邱欽堂、邱文球、康正立、康健時等曾在日治時期接受專業林業教育的臺灣人，或因殖民統治之差別對待的緣故，如非在總督府擔任低階職員，便是遠走滿洲，尋求更多學以致用的機會。戰爭期間，他們痛感臺灣森林遭到日本資本家及其臺灣協作者的聯手破壞，也痛心戰後初期接收殖民林業的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未能診斷臺灣森林破壞的根源，從而斬斷臺灣林業的殖民過去，讓那些靠做日人林業生意、大發戰爭財的本土業者就地合法。他們於是加入林產管理局的陣容，以其對臺灣林業之特殊性的熟稔，協助具水利工程專業的歸國學人唐振緒，以「保林」為方針，期待臺灣能重新贏得「福爾摩沙」的美名。⁴³

⁴¹ 唐振緒，〈臺灣省林產管理局成立日告同仁書〉，《林產通訊》，第1卷第1期（1947年9月），頁2。

⁴² 關於唐振緒擔任局長後推動的種種改革，我們已另文分析，詳見：洪廣冀、張嘉顯，〈「林務局之惡聲狼籍，布於全島」：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臺灣林業〉，《臺灣史研究》，第30卷第1期（2023年3月），頁137-185。關鍵史料見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本局第一次局務會議紀錄〉，《林產通訊》，第1卷第1期（1947年9月），頁11-17。

⁴³ 關於戰後初期臺灣林業人對殖民林業的看法，以及對林業的理想與抱負，見邱文球，〈臺灣林業史概論及其林業之特異性〉（臺灣：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林務局，1947年）；邱文球，〈對本省林業建設之管見〉，《林產通訊》，第1卷第1期（1947年9月），頁11-17。

即便有唐振緒及林產管理局幹部的勵精圖治，魏道明似乎心意已決；再加上，在短短三個月間，徐慶鐘似乎就招募到合適的人才主持林務科，也擬定林政與林產分治、由前者統御後者的「林政一體化」構想，身為三級機關首長的唐振緒，也只得調整原先以整體、多目標規劃為核心的構想，將林政部門切出，移交給農林處。

1947年9月5日，唐振緒擬妥組織章程草案上呈徐慶鐘，以為林政與林產分治後林產管理局的基本架構。該草案首條規定「臺灣省政府為管理全省林業之業務起見，依據《農林處組織規程》第14條之規定，設置林產管理局，隸屬農林處」。第2條則將林產管理局之職掌規定如下：一、關於國有林野之調查事項；二、關於國有林野之經營事項；三、關於保安林及海岸林造林事項；四、關於施業案造林事項；五、關於治水造林及防砂工程事項；六、關於優良林木種苗繁殖事項；七、關於林產物之生產、加工及供應事項；八、關於國有林野營林附設道路及鐵路之興築及管理事項；九、其他有關林業之業務事項。該組織章程第4條明訂林產管理局下設11組，分別是秘書（2課）、人事（3）、會計（4）、統計（3）、技術（3）、總務（4）、工務（6）、作業（2）、營林（3）、供需（2）與枕木組（3）。各組下再設課，共計35課。第11條規定林產管理局設林場5處（即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竹東、巒大山），直轄臺北製材工廠。第12條規定「得視業務之需要，並得設各種委員會及事務所」。在草案結尾，唐振緒添了「新舊編制人員比較表」。依據該表，相較於「林務局及所屬林產管理委員會」的員額有490至645人，林產管理局的員額已縮減76至211人，包括下屬機構則共為414至434人。⁴⁴

收到唐振緒的草案後，徐慶鐘會簽給林務科、人事室、會計室、統計室等科室主管，請他們發表意見。在其回覆中，主管表示，「該局為第三級機關，組織

月），頁20-22；康正立，〈人生與森林〉，《林產通訊》，第1卷第1期（1947年9月），頁18-20。亦值得參考者為邱欽堂的畢業論文：邱欽堂，〈臺灣民有林振興策〉（臺北：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卒業報文，1929）。引自《日治時期臺灣農業史料數位典藏計畫卒業報文》，國立中興大學藏，登錄號：nchul-tb-023565；韓，〈我們的邱副局長〉，《林產通訊》，第2卷第8期（1948年4月），頁33。

⁴⁴ 唐振緒之草案及農林處各科室之會簽見：「送林產管理局組織規程草案」（1947年9月29日），〈林產局組織規模〉，《臺灣省政府》，檔管局藏，檔號：A375000000A/0036/0012.4/0230/0001/003。

過于龐大，應將業務相近者合併縮編，並將『組』以下之『課』改為『股』」。任職統計室的林開煥甚至寫了整整兩頁的反對意見。林開煥為苗栗人，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畢業生，在日治時期曾任職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之「屬」（負責統計），總督府食糧局技手（負責米穀調查與統計）與臺灣殖產工業株式會社技師（負責會社經理與林業計畫）；戰後，他曾任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林業部管理員（擔任接收）、長官公署統計室專員（編製生命表）等，對林業並不陌生。⁴⁵ 林開煥將林產管理局界定為「前林務局林產管理委員會改組合併而成」，而「前林產管理委員會第一組僅設五科，第二、三兩組因業務有限，未曾設科」。即便如此，林開煥寫道，「當時一般本省人民，已認為管理林務機關，組織似嫌過大，責〔按：嘖，原誤〕有煩言」。他認為依據該草案，林產管理局業務範圍「僅有五處山林場所，一個製材工廠」，但「組織依然龐大，人員有四百以上之多」。林開煥認為，「近年伐木多於造林，是林業前途暗伏危機，亟待吾人謹慎從事。若如依然設置龐大之機關，而事蹟不著，人浮於事，耗費公帑，恐將更招致人民之不滿」。他建議「將工作性質相近者歸併辦理，以撙節開支，而減少人民之負擔」。技術室主任朱剛夫則較務實地看待唐振緒的草案。其意見為「該局已成立三個月，人員多已由省府核派」；換言之，若無省府核可，他們也無從要求唐振緒縮減林產管理局員額與組織規模。朱剛夫是以建議，在審核林產管理局之組織草案時，焦點應放在「職掌部分」，「俾使免與本處林務科重複」。⁴⁶

9月9日，徐慶鐘發布訓令，正式要求唐振緒得依據省府第三次委員會決議，將屬於林政機構之前林務局所屬經理、林政、林產三課，山林管理所十所暨模範林場四處剋日劃歸該處接收調整」，如此方能讓「本省林政之積極推進與林務之

⁴⁵ 關於林開煥參見林佩欣，〈他山之石：國民政府在臺灣的業務統計體系接收與重建（1945-1949）〉，《興大歷史學報》，第31期（2016年12月），頁101，全文頁碼為93-122。林開煥履歷見「林開煥任免通知書」（1947年7月7日），〈農林處人員任免〉，《臺灣省政府》，檔管局藏，檔號：A375000000A/0036/0032.34/0029/0001/019。

⁴⁶ 唐振緒之草案及農林處各科室之會簽見：「送林產管理局組織規程草案」（1947年9月29日），〈林產局組織規模〉，《臺灣省政府》，檔管局藏，檔號：A375000000A/0036/0012.4/0230/0001/003。

正常發展」。他也令唐振緒則將3課、10所與4場的公物、財產、案檔、人員、預算分別造冊，移交給新任林務科科長胡煥奇。⁴⁷

假若農林處與林產管理局間的糾葛是一場戰爭，第一回合由徐慶鐘大獲全勝。

伍、起而攻之

副局長邱欽堂覺得該是他出面的時候了。出身苗栗的他，為臺北帝國大學取得林學博士，專攻森林經營。只是，或因殖民林業教育體制並未給本島人太多機會，他遠赴滿洲國發展，於山林局中擔任要職。二二八事件後，時為東北大學教授的邱欽堂，決定返回臺灣，並接受唐振緒的邀請，擔任副局長。9月上旬，當唐振緒創設枕木組，以回應省府「林產管理局當負起臺灣省內外之枕木供給」的指示時，他又接下枕木組組長一職。做為臺灣首屈一指的林業人才，對於殖民政府在推動臺灣森林之科學經營上投注的經費與精力，邱欽堂深感佩服；只是，對於此「科學」卻刻意排除臺灣人參與林業的機會，獨厚某些與政府關係密切的日本資本家，引發人民反彈，最後導致森林濫伐，他深感痛心。他之所以加入林產管理局，擔任唐振緒的副手，便是為其推動改革的決心所吸引。如同唐振緒一般，他認為林政與林產分治絕不會是臺灣林業的根本大計。當唐振緒拜會省主席、尋求指示時，他決定直搗黃龍，安排一場與農林處林政科的會議。他準備追問這些號稱能掌管林產管理局的林政長官，什麼才是最適合臺灣的林業政策。

9月18日，邱欽堂率領技術室、作業組、營林組與林場主管共15人，前往農林處。在這15人中，作業組康健時與營林組康正立均為受過殖民林業教育、也曾在總督府中任職的臺灣林業人。不僅如此，當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成立時，他們也因對殖民林業的熟稔，為局長黃維炎重用。唐振緒也蕭規曹隨，任命兩人為作業組與營林組組長，仰之為林產管理局的骨幹。林務科則有11人出席。林務科長胡煥奇因事請假，由經理組潘迺賡、林產組李淦代表。因此，此發生在9月18

⁴⁷ 徐慶鐘，〈臺灣省政府農林處訓令〉，《林產通訊》，第1卷第2期（1947年9月），頁2。

日的會議，雖說是農林處林務科與林產管理局就林政與林產該如何分工合作的協商，但同時也可說是共享臺灣之殖民過去的臺灣專業人，就林業——甚至是臺灣島——的未來，展開的直球對決。

會議由邱欽堂開場。他表示「查現行之林務機構已劃分行政與事業發展為原則」，但問題是，「自本省光復後，各種事業部門尚多複雜分歧，致業務無從聯繫，亟應予以合理之調整劃分」。有鑑於此，他特安排此次會議，先由各林場主管報告，「請林務主管蒞臨指示」。⁴⁸

各場長緊接著發言，內容環繞在林場設施陳舊、範圍狹小、可供開發之天然林有限、業者競爭等困境。他們希望林務科能將林場周遭的天然林交給局裡規劃，各林場才有未來可言。場長語畢，邱欽堂給林務科代表們上了一課森林經營學：

各林場之事業，必須要有整個之施業計劃，為達到此計劃，必須要有一定之事業地區，否則零碎施業實非百年樹木之根本原則，以前在日本時代曾由營林所統籌全般事業地區，其後由臺拓會社，分割申請經營，以致在預定之事業地區，摻入零碎商營林班，手續繁雜，事業參差，不能求得整個林業之發展，故今後為求積極統籌起見，擬請決定適當之事業地區，以利目前之增產及今後之事業計劃。⁴⁹

要之，邱欽堂認為，目前林產管理局掌管的森林面積實過於狹小，或說零碎，導致無法確立經營計畫；無計劃的伐木與造林，只會事倍功半，對臺灣林業的發展，並無裨益。

在聽取林產管理局的報告後，潘迺賡表示：「本科成立伊始，本人對此種原則，擬不使就此決定。」邱欽堂施壓：「本日之座談會，雖不能作具體的決定，但為今後之事業計劃，希望能得概略之原則指示。」其中，林務科官員謝景新則把包袱丟回，要林產管理局先提出「具體之計劃書」。太平山林場沈家銘、八仙

⁴⁸ 不著撰人，〈農林處林務科林產管理局劃分分擔事業區談話會〉，《林產通訊》，第1卷第3期（1947年10月），頁14。

⁴⁹ 不著撰人，〈農林處林務科林產管理局劃分分擔事業區談話會〉，《林產通訊》，第1卷第3期（1947年10月），頁15。

山林場林坤茂、阿里山林場陳龍馨與作業組康健時立刻反駁，表示林務科得先樹立原則，否則他們無法擬定計畫。林產組李淦則打算把責任推到不在場的長官身上。他說「本日徐處長及林務科長均因事未能出席，而本席以為係聽取報告，故本席擬將各項問題請示後再做決定」。康正立決定攤牌：

林務方面，事業地區之管理及行政須以施業案為憲法，而事業機關之本局非僅作斫伐而已，實兼有實施造林之任務，以林養林之主旨。故林務與事業必須相輔而行，始能求林業之發展。查本省之針葉樹日漸減少，對秀姑巒溪，實應予以保存勿使商業者零碎斫伐，又花蓮港縣接收之木瓜山，羅東紙業公司接收之林田山，既不繳交樹代金，又不施行造林，為本省林政上，殊不合理，故應採取妥善方式以經營（或令飭其造林），綜合各林場所報告之實情，至希從速決定事業之地區，以利業務之開展。⁵⁰

康正立彷彿以過來人的身分，「指導」林務科該如何經營那一大片甫自林產管理局手中接過的國有林；當中關鍵是，林務科不要一手箝制林產管理局的施業範圍，另手又允許某些公司或政府機關持續伐採國有林，甚至還免除其繳納「樹代金」的義務，即國有林之使用者在使用前應繳給政府的金額。他要說的是，如此厚此薄彼，對於肩負臺灣之林產供出及造林業務的林產管理局，並不公平。

改組後才至農林處服務的林政組蘇定宇打圓場：「本人感覺林場必須有一定之事業地區，始能實施其工作計劃」。此時，因遲到而未參與先前討論的技術室朱剛夫發言，表示他先提出些意見，而他會呈請處長核示，他「相信處長與科長亦能同意」云云。朱剛夫的意見其實就是「同意」林產管理局代表提出的要求；如為各林場劃設事業區、林務須以「施業案為憲法」、事業區不得零碎分散、排除事業區中的業者與「商營林班」等。⁵¹

朱剛夫的發言為會議劃下句點。邱欽堂表示，「朱主任指示四點原則當依照辦理，對於林務科與本局之業務，今後當密切聯繫，使達到臺灣林業發展之目

⁵⁰ 不著撰人，〈農林處林務科林產管理局劃分分擔事業區談話會〉，《林產通訊》，第1卷第3期（1947年10月），頁15。

⁵¹ 不著撰人，〈農林處林務科林產管理局劃分分擔事業區談話會〉，《林產通訊》，第1卷第3期（1947年10月），頁16。

的」。⁵² 在10月的局務會議上，他跟同仁報告與農林處林務科協商的結果。他勉勵同仁，林產管理局當前的窘迫應是一時的；只要同仁堅守崗位，他相信長官遲早會發現目前林政與林產分治的不當。至少在林場部分，他預期林務科很快會做出相應調整，擴大各林場的範圍、劃設事業區、為各事業區編製經營計畫、排除那些在林場周遭虎視眈眈的業者等。如此一來，他表示，至少在林場部分，林產管理局還是可以做到林業的整體化與一元化，進一步朝向以林養林、臺灣林業的永續而邁進。

當邱欽堂傾向協商溝通、追求共識，唐振緒走向另一極端。他似乎認為，與其花時間跟農林處的技術官僚開會，或亦步亦趨地擬妥方案，先送農林處審核，若無意見再送至省主席，最後由省府公告實施，他認為有更有效率的做法。憑藉著他與省府高層的關係，他擬妥方案後，先以「簽呈」送至秘書長徐道鄰，央其轉呈魏道明；在魏道明做出「手諭」或「口諭」後，徐道鄰告知唐振緒；唐振緒便認為其方案已跑完整個行政程序，便公告實施。以如此作法，他於9月公告實施保林方案。他表示「森林為臺灣之生命」，「破壞本省森林者，即為全省之罪人，應全體起而攻之」。他希望「父戒其子，兄勉其弟，共負保護之責，隨時協同本局各山林管理所所在地員工，取締搶救，是為至盼」。他宣布，「自通告之日起，仍有盜伐、濫伐、濫墾、縱火燒山情事，一經查獲，定予嚴懲不貸」。⁵³

從表面上看，該通告似乎表達林產管理局保林的決心——但問題是，在唐振緒發布該通告的當下，保林既非該局業務，而山林管理所更非該局所轄。因此，與其說該通告是以主管機關之姿對旗下分支機構發號施令，倒不如是要給農林處下馬威。唐振緒要傳達的訊息是，農林處得管好轄下的山林管理所，不要再讓森林遭受破壞；若農林處不能做好此分內的事，負責全省造林的林產管理局就得出來收拾殘局，而處長徐慶鐘與林務科長胡煥奇將會是「全省之罪人」，可「全體起而攻之」。

⁵² 不著撰人，〈農林處林務科林產管理局劃分分擔事業區談話會〉，《林產通訊》，第1卷第3期（1947年10月），頁16。

⁵³ 「集集鎮頂坎里等127名里民請願將26、27林班准予配耕以維民生」（1948年8月3日），〈經建／農林／林業／總節〉，《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14330037005。

再者，有鑒於林產管理局所轄林場以生產針葉材為主，要滿足各方木材需求已感吃力，用作枕木更是暴殄天物，唐振緒於10月擬定〈林產管理局加強枕木生產供應及管理方案〉，同樣繞過農林處，經魏道明核准後，便公告實施。細讀該方案內容，可能會有個錯覺，即林產管理局才是臺灣林業的主管機關，而非農林處。該方案要點有三：首先，「凡以前准許伐採之林班，及在枕木增產期間核准開放之林班（或小班），應由農林處林務科迅速調查各林班內可供製作枕木用材之樹種及數量，詳細製成統計表，發交林產管理局，以供考察」。其次，「天然林而運輸設施不感困難之林班（或小班）應盡量開放採伐，由申請採伐者呈經農林處核轉省政府核准後為之」。第三，枕木生產督導則由「農林處林務科、林產管理局、各縣市政府及各山林管理所分別負責督導之」，且業者製成之枕木，統一由林產管理局收購；以當時即在林產管理局中任職、日後成為林業史大家姚鶴年的說法，該局推動的是一類枕木專賣制度。⁵⁴

就如9月公布實施的保林方案一般，唐振緒是在越俎代庖，以三級機關首長的身分，指揮上級機關要怎麼做。對唐振緒而言，此舉無可厚非；在當時瞬息萬變的局勢中，考慮到省府加諸在林產管理局上的重擔，唐振緒不認為他有那個餘裕，將涉及國防、交通與民生的政策構想，餵入省府此龐大的官僚體系中，再期待該體系可吐出即時的解方。但農林處不見得會如此想。日後，當農林處與林產管理局的衝突甚至成為八卦雜誌的題材，記者指出，唐振緒憑藉與省府高層的關係便發布法令、要農林處聽其指揮的作法，是雙方不合的開端。記者又說，徐慶鐘是個「好好先生」，還可不以為意；副處長陳世燦就大發雷霆，認為唐振緒罔顧行政倫理、不把長官放在眼裡、意圖架空農林處。⁵⁵ 從前述保林與枕木專賣的法案內容來看，陳世燦的反應不算過分；留美工程師唐振緒，恐怕自始便不認為，學農的徐慶鐘與學法律的胡煥奇，有任何資格可以指揮林產管理局，遑論推動所謂「林政一元化」。唐振緒之所以如此魯莽，甚至膽大妄為，除了他與省府高層的關係外，更關鍵的理由恐怕是，如邱欽堂、康健時與康正立等臺灣林業

⁵⁴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規章類：本局加強枕木生產供應方案〉，《林產通訊》，第1卷第5期（1947年11月），頁2-3。

⁵⁵ 本刊特約記者，〈農林處·林產局·唐振緒〉，《公理報》，第2卷第1期（1948年9月），頁9-10。

人，選擇與他站在一起，既為林產管理局的現在，也為臺灣林業的未來，對於其眼中不合理的林政制度亦須「起而攻之」。

然而，就在農林處與林產管理局就「何謂臺灣最理想的林政制度」而僵持不下時，派駐在臺灣各角落、負責執行林業政策的基層官員，不免無所適從。這些坐在臺北辦公室裡頭的長官，心中所念者是要保林，還是希望把可以砍伐之天然林儘速開放給業者伐採？是要壓抑業者勢力，還是要整合業者之力投入增產？是要服膺有省主席為後盾之林產管理局的命令，還是要服從臺灣林業主管機關農林處的指示？

陸、基層的兩難

1948年5月1日星期六，新竹山林管理所所長徐兆莘正讀著一張匿名的便條。他大為驚駭。該便條開頭寫著：「茲因有緊急事密告，先生祈求小心警戒。」密告者表示，所裡有人不滿徐兆莘之人事調度，「感覺從來優越感被先生粉碎」，無法「擅權」，因而轉入「地下活動」，準備「追放」徐兆莘。他說，就在4月29日晚上，幾位「首謀者」召集管理所之工作站主任舉行秘密會議，還在某種文件上蓋章。他強調他既未與會，更未蓋章；但正因為如此，隔日上班時，他感到辦公室「空氣陰險」，「不得已請假離開辦公室」。密告者哀嘆「一人不能拒絕大眾之壓力」，但他又不願與其同流合污，故他今天也不能辦公，在簽到後便會離開，懇請所長諒解。⁵⁶

讀畢這張便條，徐兆莘不由得自忖，在接下新竹山林管理所所長一職以來，他是做了什麼事，才會讓下屬不滿至此，甚至到要「追放」他的程度？

徐兆莘主持的新竹山林管理所為成立於1946年4月的地方林政機構。在此之前，該所為新竹州所轄之山林事務所，戰後則由新竹縣政府接收，歸建設局所管。

⁵⁶ 「為溫宗見等所控所長濫用職權核與事實不符仰知照由」（1948年5月7日），〈新竹山林所人事任免（0037/032.34/150/5）〉，《臺灣省級機關》，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0323403447021。

1946年3月間，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長黃維炎認為，林政應由該局直轄，方能達成林業之一元化，故在行政長官陳儀的同意下，要求全省9縣將山林事務所交出，由林務局派員接管，增設埔里一所，並統一名稱為「山林管理所」。經此調整，黃維炎期待，各山林管理所就不會是各縣府下微不足道的行政末梢；以他的話來說，若林務局為臺灣林業的「大本營」，那山林管理所就相當於駐紮各處的「前哨站」；局裡政令一出，山林管理所就會宛如「臂膀」般地動起來，在取締盜伐、濫墾的同時，也指揮那些有商譽、具經驗與資本的在地業者，於無礙國土保安的森林中展開伐木造材，並向其收取合理的「代金」，國利民生可獲得兩全。4月1日，新竹山林管理所成立，下含分所3處與工作站2處，管轄桃竹苗一帶面積達117,762公頃的國有林，總部則設在新竹縣政府旁中山路上的一棟木屋內。⁵⁷

黃維炎將山林管理所視為「前哨站」或「臂膀」反映其林業一元化的理想；然而，事實證明，這十條臂膀不若他以為的強壯；甚至可以說，在各地盤根錯節的林業勢力前，這些臂膀如不是手無縛雞之力，便是為「大本營」種種脫離地方脈絡的命令所限，左支右絀且動輒得咎。新竹山林管理所便為一例。首任所長鍾毓為出身屏東內埔，自幼即赴廣州求學，取得廣州中山大學林學學位，歷任廣東梅州農業學校林科主任教員、西康省模範林場場長、貴州農業改進所兼系主任再兼第一林場場長，為黃維炎打造林業一元化體系的得力助手。然而，鍾毓任職不過數月，便因同情業者在當時林務局限伐政策中的困境，推動種種便民措施，在贏得桃竹苗在地業者的擁戴之餘，遭檢舉為官商勾結，而被黃維炎撤職查辦。⁵⁸

⁵⁷ 〈本所沿革及歷任主管長官一覽表〉，收入新竹縣山林管理所編，《新竹縣山林管理所概況》（新竹：新竹縣山林管理所，1949年），無頁碼。該所成立之際的主管林地面積，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於1946年1月的資料，見《臺灣省統計要覽：第二期》（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年），頁46。關於戰後初期新竹山林管理所的工作條件，見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決議案件彙編〉，《林產通訊》，第3卷第6期（1948年7月），頁22徐兆莘之提案，全文頁碼為頁22-72。

⁵⁸ 鍾毓生平見：「鍾毓訃聞」（1989年1月25日），〈鍾毓訃聞及生平事略〉，《個人史料》，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1280066490001A；王國瑞，《臺灣林業人物誌：第一輯》，頁3-4。「新竹竹東古承鼎等為新竹山林管理所所長鍾毓遭撤職案，請臺灣省參議會仗義執言代為轉函收回成命」（1947年1月25日），〈總務／人事／任免／總節〉，《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10230036001。

第二任所長陳卓雄在1947年2月接任所長後，既有鍾毓前車之鑑在先，又有二二八事件的社會動盪在後，面對食髓之味、且不時想得寸進尺的業者，難有作為，於7月隨著林務局改組為林產管理局時，遭到資遣，從此淡出林業界。⁵⁹ 第三任所長黃永馨為臺中人，畢業於臺灣總督府農林專科學校森林科，曾任總督府營林所東部出張所僱員、花蓮港出張所僱員暨花蓮港廳勸業課林務係技手、花蓮縣政府建設科技士、埔里山林管理所技士等職，在學經歷上均無可挑惕。即便如此，在被唐振緒任命為新竹山林管理所所長後僅僅7個月，他便遭控貪污，於1948年2月遭徐慶鐘撤換，改任農林處第三模範林場場長。⁶⁰

徐兆莘為新竹山林管理所成立以來的第四任所長。出身浙江省東陽縣的他，1912年生，在取得日本大學社會學部農村經濟科學位後，擔任浙江省政府建設廳合作事業指導員、同省合作促進會研究員、同省昌化縣政府技士與建設科長、湖南省政府地政局技正等職。徐兆莘於1947年來臺，擔任臺中縣農林總場技術課長；翌年2月，徐慶鐘令其出任新竹山林管理所所長，期待徐氏能以其農經專業與行政經驗，為這個成立不滿兩年已四易所長的在地林政機構，帶來新局。⁶¹

上任後的徐兆莘積極推動林產處分，協助農林處落實唐振緒的〈林產管理局加強枕木生產供應及管理方案〉。這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管理所得先確認該片國有林是否位在保安林內；若答案為否，管理所得遣人查定邊界、樹種與材積，按市價推估林木價值，令業者推估生產成本，考量市價變動，計算該向業者收取多少樹代金。業者開工後，管理所還得派人巡視，預防業者越界砍伐，同時得查驗業者伐倒搬出的木材，撲滅任何濫伐與盜伐的非分之想。當業者完工後，所裡便得檢查伐木跡地；若業者搬出材積與原先估算者誤差太多，所裡還得檢討是那個環節出了問題，必要時得令業者補繳代金。過程冗長繁複就算了，身為政策執行者的山林管理所，本身不具備任何決策的權力；大從事業計畫擬定、伐木

⁵⁹ 「林務局人員劉諷吾陳卓雄請調派案」（1947年01月15日），〈林務局及所屬人員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303234362008。

⁶⁰ 〈新山林管理所長，黃永馨榮調〉，《臺灣民聲日報》，臺中，1948年2月18日，版3。

⁶¹ 「農業試驗所臺中試驗支所技正兼園藝系主任徐兆莘等調派辭職案」（1948年2月6日），〈各縣市試驗所人員任免案（0037/032.34/171/4）〉，《臺灣省級機關》，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0323403489006；王國瑞，《臺灣林業人物誌：第一輯》，頁33。

區設定與材積計算，小至業者開闢林道須移除的障礙木，以及所需繳交的代金金額，管理所都得層層上報，獲得層峰裁示後，才能有下一步動作，否則承辦人可能惹禍上身，而主管也會難辭其咎。要之，假若「加強枕木生產供應及管理」無健全、理性與高效率的官僚體制支撐，無異緣木求魚。

徐兆莘發現，新竹山林管理所之所以自成立以來一事無成且弊案纏身，關鍵就在欠缺此體系。之所以如此，理由可能有四：一、熟稔在地林政事務者多為日人，而日人已陸續遭遣返回國；二、具林業背景的臺籍林業人原本就鳳毛麟角，多進入林務局或林產管理局擔任幹部；三、願意遠渡來臺投身林業者，也多在局裡或各山林管理所擔任主管；四、影響所及，原本在所裡擔任技工等事務的臺人，雖不具備任何專業能力，然基於社會安定考量，也被破格提拔，擔任管理所幹部。當徐兆莘發現此點後，他向徐慶鐘抱怨，「現有工作人員水準欠高，尤苦乏高級技術人員從事設計推進工作及辦理文書人員」。例如，他指出，所裡主掌業務部門、核稿及設計推進工作者，理應身先士卒，確保長官交辦之事能如實進行，卻「總日危坐案頭無所事事」；同樣的，理應盤點、管理與守護所內資產的「總務組長」，連基本的文書能力都付之闕如。有鑑於此，徐兆莘自「原有技工資學歷能力較高者」當中提拔優秀者為幹部；他也四處探詢，招募那些具大學或專科學歷者至所內擔任幹部；至於那些看來是能力與職位遠不相配者，他則為其安排非技術性的工作，如巡山、木材查驗、伐木跡地檢查等。如他向徐慶鐘報告的，自其上任以來，「欲謀事業成功必須就地爭取幹部，培植幹部，化阻力為助力」。⁶²

然而，如5月1日的匿名便條所陳，徐兆莘「化阻力為助力」之舉卻招致更大的阻力。若干被調職、降職或被派至「山場」工作的管理所幹部，醞釀反撲。他們完成陳情書一份，列舉徐兆莘的各大罪狀。在人事方面，他們痛批徐兆莘「不准技工請病假又擅自開除、將相關行政人員調至山場工作」，以及「任用私人不合格及無工作能力，擬薪太高，蔑視舊職員，使舊職員不能工作」。在林業專業方面，他們表示，徐兆莘私自挪用造林經費，大擺宴席，還擅權批准業者砍伐竹東事業區94號

⁶² 「為溫宗見等所控所長濫用職權核與事實不符仰知照由」（1948年5月7日），〈新竹山林所人事任免（0037/032.34/150/5）〉，《臺灣省級機關》，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0323403447021。

林班，收受樹代金高達500萬元。他們主張徐兆莘「倒行逆施，種種違法，不特職等處於人人自危之境，且影響林業工作前途阻礙工作匪淺」。4月29日當天晚上，在完成陳情書後，他們召集所內148名員工，涵蓋組長至技工各階層，要他們在一張B5大小的公文紙上蓋章。該陳情書隨即送往臺北，交至徐慶鐘手中。他們期盼，這位臺灣最高農林首長，能體會他們的困境於萬一，革除徐兆莘所長一職。⁶³

收到陳情書後，徐慶鐘令徐兆莘答辯。5月15日，徐兆莘完成一份鉅細靡遺的答辯書，呈給農林處。他細數上任以來目睹之種種怪現狀、說明其人事調度的邏輯，以及其推動改革的苦心。面對所有違法亂紀、官商勾結之指控，他全盤否認，怒斥此舉「實屬幼稚」，「不若將近六旬老人之所為」。他希望農林處派員徹查，若放任這些人為所欲為，將嚴重影響「行政紀律及林業工作前途」。他感嘆，該所人事之複雜、舊勢力之盤根錯節，超乎他的想像，難怪「歷任所長雖時僅數月均在控告查案中度生活，對事業未能稍有建樹其工作之未有表現」；他原本以為能多少有些作為，但上任三個多月以來，「目睹應興應革之務孔多，處此不安定環境中痛感心餘力拙，成效難著」，自覺「尸位素餐，故無以對鈞座之恩德，更非職之意願」。⁶⁴

目前不知徐慶鐘是否派員徹查，但可以確定的，他相信徐兆莘的答辯，令其待在原職，繼續推動改革。不難理解，經此風波後，新竹山林管理所辦公室的「空氣」將持續「陰險」，那些蓋章的148名員工將日夜擔憂所長的挾怨報復，原本已勢單力薄的徐兆莘，恐怕不只會心餘力絀，而是心力交瘁。徐兆莘案為徐慶鐘上任以來接觸到眾多密告與陳情案之一。日後，他將公開表示，臺灣林政問題便是人事問題，因人事糾紛導致政策窒礙難行，釀成更多林政問題；政府祭出的改革策略，又因更為盤根錯節的人事，難有成效。確實，徐兆莘案顯示，農林處與林產管理局的對立成為基層的兩難，甚至成為有心推動改革者的緊箍咒；當

⁶³ 「為溫宗見等所控所長濫用職權核與事實不符仰知照由」（1948年5月7日），〈新竹山林所人事任免（0037/032.34/150/5）〉，《臺灣省級機關》，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0323403447021。

⁶⁴ 「為溫宗見等所控所長濫用職權核與事實不符仰知照由」（1948年5月7日），〈新竹山林所人事任免（0037/032.34/150/5）〉，《臺灣省級機關》，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0323403447021。

徐兆莘積極處分林班，便遭異議者指為縱容業者濫伐；不難想像，若他積極推動保林，也可能被控為瀆職，罔顧國難當前下激增的枕木需要。

基層的兩難不會只留在基層，而會向上延燒。對唐振緒及林產管理局幹部而言，由於林政與林產分治後，山林管理所歸農林處管轄，他們在意的不會是山林管理所的人事紛擾本身。回到1947年10月。他們原本期待，能透過枕木增產方案，結合農林處所轄的山林管理所之力，減輕林場負擔；然而，如果說像掌管豐富之闊葉林資源的新竹山林管理所，都無法動員在地業者，完成任務，這就意味著，枕木專賣的算盤已經打錯，或者更精確地說，打得太精，未能考慮到，政策能否收效，關鍵仍在於人。但不管是算盤打得太精，或根本打錯，橫亙在林產管理局幹部面前的，是更為迫切的問題：該如何以占臺灣國有林之5.7%、如非風中殘燭便是仍在蹣跚學步的五大林場，以平價配售木材給軍方、公家機關與民間的同時，再滿足島內外高漲的枕木需求？唐振緒及其幹部很快就擬定了策略，尋找外援，並伺機自農林處手中奪回山林管理所的管轄權。他們期待的是回到山林管理所為大本營林務局之「臂膀」與「前哨站」的時代；當前由兩個大腦指揮十條手臂的半癱瘓狀態，必須改變。

柒、林業社群的出擊

1947年10月2日。阿里山林場。

坎培拉林學院（Canberra School of Forestry）學士、西澳大利亞伯斯（Perth）前林務官、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林業顧問藍高梓（George W. Nunn），簡直無法相信他的眼睛。投身林業研究已30年的他，自認看過的森林不少，但能與阿里山林場相匹配者，可說絕無僅有。與之同時，他也感到遺憾，臺灣當局似乎完全不了解這片森林的價值；否則，如他向《申報》記者楊文育表示的，該如何解釋「在紐約最高級旅館裡的屏風原料，這裡拿來做枕木」；堪做「鋼琴、凡亞林〔按：小提琴〕的高貴木料，這裡用來做窗戶，搭欄干」；「美金四元一尺的木材，在各處堆著讓它腐爛」。在後續參訪八仙山的行程中，藍高梓對於臺灣林業的困境，有了更深的體會。他自認他已診斷出兩大病灶：錯誤的政策及經營

者的短視。在政策方面，他跟記者楊文育表示，他不能理解臺灣當局為何要禁止木材出口；「澳洲多的是質地堅硬的枕木，能久耐用；只要這裡少數的針葉樹，可以換到他們大批的枕木」。他直陳，「好木材在臺灣是暴殄天物，然用之於供應世界，是足以增加臺灣財富超越目前的二、三十倍」。那麼，如何才能撥亂反正？藍高梓認為，臺灣當局有必要「訂立一個具體的五年計劃，在這五年內，林管局可以將所有的收入拿來為林管局本身添置器材，整理鐵道，開發新林場，五年以後再繳向國庫」。如此一來，他估計，「收入至少可加十倍，不是指木材〔按：銷售〕的多寡，而是完全靠Good selling」。最後，他意有所指地表示，「國家經營〔林業〕這種大規模事業，眼光第一不能短視」；然而，須在「在一個指揮者督導下努力」的國家林業，在臺灣竟被硬生生地切成兩半，由不同部門指揮。他認為，由於兩部門均無法掌握林業的全貌，只能無所不用其極地解決眼前的燃眉之急，殊不知他們是在提油救火，甚至是殺雞取卵，臺灣社會遲早會因林業當局的短視而付出代價。藍高梓語畢，楊文育立即明白這名澳洲人是在指涉什麼。似乎害怕讀者抓不到重點，他還為藍高梓此段發言提綱挈領：「這一點針對著我們的行政制度上發的牢騷，也是頗值得我們自己警惕的」。⁶⁵

在致林產管理局的報告中，藍高梓則做如下說明：

森林之更新或造林，必需隨砍伐而立即開始，全面森林之統治，必需在一個林業治權之下執行，而此一統治機構，更需每年有確定之收入，專作發展以及賡續此長期經營之程序，此乃林業之信條也。目前因缺乏明確之森林法，其結果所有森林之管理，由農林處處長與林產管理局局長分別直轄，其結果，批售林班與保林歸一主管，而伐木與造林又歸另一主管。因之無整個準確之森林財產與工作計劃可言。

藍高梓對臺灣林業的批判與告誡，正是唐振緒、邱欽堂、孟傳樓等林產管理局幹部希望看到的。事實上，這位聯合國林業顧問之所以能前往阿里山、八仙山等林場視察，甚至還接受記者訪問，均是唐振緒等人刻意安排的結果。時間倒推至1947年9月。當林政與林產之分治已成定局，唐振緒即遣副局長張韶初前往上

⁶⁵ 楊文育，〈風雨八仙山〉，《林產通訊》，第1卷第4期（1947年10月），頁11-12。

海採購器材。張韶初為廣東梅縣人，為唐振緒在唐山工學院就讀時的同學，日後取得密西根大學工程學碩士，曾在中國鐵路建設上扮演關鍵角色。在其報告中，張韶初表示，雖說他在卡車、鋼索等器材上略有斬獲，但「因臺銀匯款欠暢，國幣頭寸不敷，未能在上海大量採購，與所需器材相差甚巨，同時市面上採購價格價格極昂貴，所需資金龐大，難以籌措，要解決此問題，得另闢蹊徑。得先邀請聯總專家來臺視察」。⁶⁶

此聯總專家便是藍高梓。為了讓藍高梓可在短時間內目睹臺灣林業的病灶，從而引入聯合國救濟總署的資源，唐振緒等人在行程安排及隨行人員上做足了功夫。此視察團由唐振緒親自帶領，由主任秘書吳符生、作業組組長孟傳樓、作業組生產課課長王添福、秘書齊松泉、專員王長春與機要課課長黃次雲隨行；視察對象以阿里山、八仙山與太平山三大林場為主，但也兼及山林管理所、縣市政府等業務亦涉及林業的地方行政單位。唐振緒還令隨行幹部撰寫報告，必要附上照片，連同藍高梓的觀察，出版為《林產通訊》專刊。藉此，他期待能喚起大眾對臺灣林產管理的重視。最後，彷彿擔憂林業人的文筆不夠動人，他邀請了《申報》記者楊文育加入視察團。他認為，楊文育曾在二二八事件後造訪阿里山，今昔對照下，想必能體會林產管理局在重振臺灣林產事業上投注的心力。至於允為林產管理局之主管機關的農林處，無人受邀。⁶⁷

林業試驗所所長林渭訪（1896-1974）同樣擔憂臺灣林業的未來。林渭訪為浙江省臨海縣人，於1922年取得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學位後，於浙江省立甲種農業學校、浙江省農業專門學校、國立浙江大學、河北省立農學院、國立河南大學農學院、國立廣西大學農學院、福建省立農學院等校任教，也曾主持福建省研究院農林研究所與福建省農業改進林務所。1930年，他赴皇家薩克森森林學院（*Königliche-Sächsische Forstakademie*; Royal Saxon Academy of Forestry）、柏林——達倫植物園與博物館（*Botanischer Garten Und Botanisches Museum Berlin-dahlem*）等處考察研究兩年。林渭訪專攻育林學與樹木學，擅於運用生理生態學的方法與理論，

⁶⁶ 張韶初，〈本局器材之購置與補充〉，《林產通訊》，第2卷第1期（1948年1月），頁33-52，引文出自頁38。

⁶⁷ 黃次雲，〈隨行記〉，《林產通訊》，第1卷第4期（1947年10月），頁30-31。

從樹木的生理特性出發，在精進樹種分類的同時，為「適地適木」此育林學的最高理想，做出突破。1945年，臺灣光復，陳儀邀其來臺接收臺灣總督府林業試驗所（1939年成立，由前中央研究所林業部改制而來）；11月1日，行政長官公署林業試驗所正式成立，林渭訪為首任所長。⁶⁸ 1947年1月，他發行《臺灣省林業試驗所通訊》，促成「林業溝通」，以求試驗研究、推行宣導、集思廣益、通力合作、身體力行、種植育護、開發利用的「一以貫之」。在〈發刊詞〉中，他以一連串驚嘆號表達他對林業試驗所的期待與展望：「研究、企業與行政連成一氣，同謀進行方針，俾知行合一，免貽閉門造車之譏！不崇尚誇張！不宣傳虛偽！以事實作證據，以地方為主體，抱互助之精神，集群策之所長，以促林業之增進，藉謀國土安寧！」⁶⁹

追求一以貫之、知行合一、連成一氣的林渭訪，對於林政與林產分治衍生的亂象，感觸想必特深。1947年底，他開始準備一篇文章，準備投至《林產通訊》上，闡明他對臺灣林業的看法。他以如下段落破題：

山林之興衰足以覘國家之強弱盛衰，徵之古今中外如出一轍，臺省山林，亦無例外，細繹林史，經日人四十餘年之治理迄今不特規模已具，而造林育林護林工夫，伐木運搬造林事業，均已實際做到，口碑俱在，無可泯滅，經我國接收後，改弦易轍，分道揚鑣，論事固多興革，覈實尚待研求。

按照他的觀察，林渭訪寫道，在接收之際，在「鐵道沿線及溪流兩岸之山林」，尚且「蓊鬱蒼翠可愛，即有少數開墾地，尚無大傷」；然而，他感嘆：

大部分材木，備受凌夷，林樹蕭疎，三三兩兩，不成林相，每自山麓以至山頂，不斷開墾，闢作耕地。山麓及山腹，間作香蕉，樹薯，山頂種植早稻茶葉，甘藷，（此種現象臺中為最，臺南次之，），此種林地，實因傾斜過甚，表土墜鬆，為雨水所沖洗，已現出紅壤，漫山赤變，拱木斂形。

他警告，「長此以往，恐有釀成如廣西瑤山板瑤所居地方之虞」。他解釋：

⁶⁸ 蘇步皋，〈本所史略（續前）〉，《臺灣省林業試驗所通訊》，第2期（1947年1月），頁15-16；王國瑞，《臺灣林業人物誌：第一輯》，頁137。

⁶⁹ 林渭訪，〈發刊詞〉，《臺灣省林業試驗所通訊》，第1期（1947年1月），頁1。

該種板獠，每在高山峻急之地，而其他板獠民租用林地，依樹以板築屋，日出就山燒墾，種植早稻，粳，樹薯。耕種初期，凜地肥美，尚可豐收，三五年後，地力耗盡，表土沖塌，石礫裸露，早稻既不可種，樹薯亦無由生，粒食無依，遂轉相遷徙，另至一地，如法炮製，輾轉輪流，竟成赤貧，生活之苦不可言狀，卒致其他獠民如金秀獠花獠等嫌其貧苦無依，絕不與其通婚者。⁷⁰

林渭訪認為他得有行動。他邀請所裡的黃希周、劉慎孝與陳振威，以及臺灣大學周慧明，再加上林產管理局唐振緒、邱欽堂、黃範孝、程復新與孟傳樓等人，於12月8日晚上，來家中便酌。他挑選該日似有深意，因為那是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的成立之日，可說是戰後臺灣林政的開端。依照《林產通訊》的紀錄，當天晚上，除了邱欽堂因故未能出席外，他們「綜論筋骨，談笑風生。而於本省林業之前途，咸願努力改進」。林渭訪等人提出三件事，希望唐振緒能倡導實行：「一、促成中華林學會臺灣分會之成立。二、將本省林業偉大之情形，拍成教育影片，以介紹於國內外人士。三、敦請我國林業界權威如梁希、陳嶸、朱惠方、姚傳法、皮作瓊諸位先生，來臺視察指導」。⁷¹

是夜未能出席的副局長邱欽堂也不打算按兵不動。1月6日，他連同另外61位「臺灣林業同志」，擬妥請願書一份，送交臺灣省參議會。這些「同志」有47位任職林產管理局，6位曾任職該局、然在改制後轉任農林處（王汝弼、劉碧源、林根樹、林瑞芳、王寶樹、張燕翼），另有1位為臺灣省木材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徐水木。依省籍區分，僅王汝弼、陳振、方廷槐、韓師休、郭寶章和何家珍等6位是外省籍，其餘均為本省籍。⁷²

⁷⁰ 林渭訪，〈視察本省山林印象與感想〉，《林產通訊》，第2卷第1期（1948年1月），頁3-8。

⁷¹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出版委員會，〈引言〉，《林產通訊》，第2卷第7期（1948年4月），頁2。

⁷² 「臺灣林業同志邱欽堂等62名請願改革本省林業機構以利復興建設案」（1948年1月8日），〈經建／農林／林業／總節〉，《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14330037002。是否任職林產管理局，係對照下列史料而來：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臺灣省林產管理局職員錄（民國卅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林產通訊》，第2卷第1期（1948年1月），頁62-85。

在請願書中，這62位「林業同志」先回顧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至臺灣省政府林產管理局的歷史，認為該局一直受到農林處的打壓，從原本臺灣林業的主管機關，到現在連一家伐木公司都不如。他們感嘆，如果說此不公平的對待，真能換取臺灣林業的將來，他們倒也甘願承擔；但實情是，限縮林產管理局的職能，求得所謂林政與林產的分治，並未帶來行政效率的提升，反倒孳生更加繁雜的人事問題與文書作業，讓基層疲於奔命，連帶臺灣寶貴的森林也付出代價。他們認為，「機構合理化」已到刻不容緩的程度；依照他們的經驗與專業，他們斗膽提出兩個方案，供參議會酌參，並提供給省府高層參考。方案一為撤銷林務科和林產管理局，創設林野局，將林政與林產融於一爐。那麼，此林野局與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有無不同？邱欽堂等人認為，在前林務局時期，林產部門係由半獨立的林產管理委員會處理，也就是說林政與林產還未真正地融於一爐；再加上，前林務局還守著「以林養林」的理想，導致林產部門營利的壓力過大；為求臺灣林業的永續，省府應有預算，支應林野局的林政費用。二者是維持林務科的編制，另將林產管理局各項業務拆散，新創設造林科與砍伐科。⁷³

從兩方案的細緻度來看，邱欽堂等人明顯偏向林野局一案。但不管是林野局，還是擴大編制的林務科，邱欽堂等人認為，當務之急是，魏道明主席得撤回林政與林產分治的成命。他們自陳機構改革「誠為本省林業同仁之宿望，而曾經數次建議於政府也」。身為公務員，他們理應當服從政府的計畫與法規，然由於當今的林業機構弊害甚大，讓他們「披瀝肝膽，冒昧條陳其利弊」。他們期待組織改革「不但可以樽節經費，且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也能促進「臺灣之產業建設」。⁷⁴

⁷³ 「臺灣林業同志邱欽堂等62名請願改革本省林業機構以利復興建設案」（1948年1月8日），〈經建／農林／林業／總節〉，《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14330037002。

⁷⁴ 「臺灣林業同志邱欽堂等62名請願改革本省林業機構以利復興建設案」（1948年1月8日），〈經建／農林／林業／總節〉，《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14330037002。

捌、澈底地變

在邱欽堂等人挺身為臺灣林業發聲時，唐振緒也積極推動他與林渭訪等人於12月8日的決議。他與臺灣攝影場長白克訂約，準備拍攝「空前一萬尺之林業教育影片」，總額計1,200萬元。他令局裡9位同仁承辦，同時派太平山林場沈家銘飛上海，聯絡內地技術人員與名導來臺協助（後來臺者為教育部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孫瑜、孫俠）。⁷⁵ 他也積極推動中華林學會臺灣分會的成立，日期定於4月10日。

較棘手者為邀請中華民國林業名宿來臺視察。他向金陵大學林學系主任陳嶸、浙江省建設廳長皮作瓊、立法院委員姚傳法、中央大學教授梁希與長春大學農學院院長朱惠方等寄出邀請函；雖說只有梁希與朱惠方給了肯定的答案，其餘皆以公務繁忙回絕，對唐振緒而言，已是一大肯定。梁、朱兩人分別代表當時中華民國林學界的先進與中堅。梁希生於1883年，浙江吳興縣人，曾參與同盟會與辛亥革命。民國創建後，他於1913年赴東京帝國大學求學，專攻林產學與森林利用。1916年，他學成返國，先於北京農業專門學校任教，於1923年赴德，於皇家薩克森森林學院（*Königliche-Sächsische Forstakademie*; Royal Saxon Academy of Forestry）攻讀林產學與森林利用，1927年返國。至1945年間，他先後在北京農業大學、浙江大學、中央大學任教。朱惠方生於1902年，江蘇丹陽人，於慕尼黑大學、皇家普魯士森林學院（*Königlich Preußische Forstakademie*; Royal Prussian Academy of Forestry）、維也納的土壤學大學（*Hochschule für Bodencultur*; 今日的 “The Univers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Life Sciences, Vienna”）攻讀林產與森林利用，1927年返國，先後在浙江大學、北平大學、金陵大學任教，也曾出任中央林業實驗所副所長。1945年後，他前往長春，參與長春大學農學院的創設，並出任教授與院長。⁷⁶

⁷⁵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本局第七次局務會議記錄〉，《林產通訊》，第2卷第5期（1948年3月），頁16。

⁷⁶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林學權威梁希朱惠芳兩教授來臺視導林業〉，《林產通訊》，第2卷第4期（1948年2月），頁14。關於梁希的詳細生平與研究，見Cheng Li and Yanjun Liu, “Selling Forestry Revolution: The Rhetoric of Afforestation in Socialist China, 1949-61,” *Environmental History*, 25:1 (January 2020), pp. 62-84; 關於朱惠方，見中國林學會，〈朱惠方副理事長逝世〉，《中國林業科學》，第4期（1978年，出版月份不詳），頁76。

在2月的局務會議中，唐振緒向同仁表示，「梁朱兩先生為我國有數林業專家，本省林業界知名人士多出其門下，有的還是他的學生的學生」。⁷⁷

2月3日，梁希與朱惠方踏上臺灣的土地。是夜，唐振緒在凱歌歸酒家設宴，邀請林業試驗所、臺灣大學、農林處的林業人與會，為兩位教授接風。2月8日起，在作業組長黃範孝、轎大山林場場長呂福和與副局長邱欽堂的接力陪伴下，兩人先展開西部臺灣林業與林學相關機構的訪視，最遠至鵝鑾鼻的恆春山林管理所所，於28日返回臺北。3月1日起，兩人東行，依序參訪太平山林場、羅東紙廠、花蓮港山林管理所、木瓜山林場、臺東山林管理所等地，11日由臺東至高雄，12日由高雄返回臺北。⁷⁸

3月17日，唐振緒於林產管理局舉行林業座談會。出席者除了該局同仁外，還包括農林處長徐慶鐘與副處長陳世燦、林業試驗所長林渭訪、臺灣大學周慧明教授、四川大學程復新教授、臺中農學院李達材教授等臺灣農林中堅。他邀請中央通訊社、報社記者與「臺灣知名森林企業家」前來共襄盛舉。當天會場「多數參加聽眾並立會場門外」，光是出席者就有500多人，「誠可謂盛極一時」。⁷⁹

座談會開始，唐振緒在致詞中表示，梁、朱兩教授來臺視察，「實為臺灣林業莫大的榮幸，也是本局最光榮的一件事」，希望「本省從事林業的同人」，把握此難得機會向兩位請教。梁希接著發表演講。他勉勵臺灣林業人要有自信。他意有所指地表示，

外國人之來臺參觀者〔按：可能就是1947年10月來臺的聯總顧問藍高梓〕，是由他們自己的眼光來看我們的，他們主觀的見解太深，總說中國

⁷⁷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本局第七次局務會議記錄〉，《林產通訊》，第2卷第5期（1948年3月），頁16。

⁷⁸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梁朱兩教授視察日程〉，《林產通訊》，第2卷第7期（1948年4月），頁3；兩人亦撰寫詳細的調查報告，見梁希、朱惠方，〈臺灣林業視察後之管見〉，收入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出版委員會編，《臺灣林產管理概況》（臺北：臺灣省政府農林處，1948年），頁253-275。

⁷⁹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林業座談錄〉，《林產通訊》，第2卷第7期（1948年4月），頁34；全文為頁34-39。

人能力薄弱；中國人又大半是崇拜外國人的，也隨聲附和地批評，有的懷疑到臺灣工作人員，有的更懷疑到臺灣林業機構，害得一部分林業工作人員失去了自信力，更害得主管人對部下動輒疑心，這是不太好的。⁸⁰

梁希表示，他在太魯閣林場親眼目睹林產管理局人員坐在原木上、隨索道下山，深深受到感動。他說，「臺灣有這樣努力這樣勇敢的林業工作人員，我相信，只要設備完善，經費充足，同心協力，分工合作，很快就會趕上日治時代的林業，這並不是我的客氣話」。⁸¹

若梁希是在扮演白臉，朱惠方便是黑臉。在其演講中，朱惠方點出臺灣林業的三大問題：一、土地合理利用問題；二、造林問題；三、木材利用問題。徐慶鐘接著發言，呼應梁希所言，認為外界對林業的批評，並不公平。他說：「他們並沒有想到各林場的設備怎樣？我們的生產量又怎樣？各山林管所上年的造林經費僅一千萬，我們在經費拮据的情況下，祇好自行設法造林，談到森林保護，我們已有人為之犧牲，如此辛苦努力，自可成功，人民間有盜伐亦非不努力取締，但在現環境之下取締盜伐頗有困難」。最後，他強調，「在林政方面，過去日本是以專制手段榨取，我們為民主國家應當和人民合作」。值此「人力財力均感困難之秋」，他勉勵同仁，「辦理誠不容易，但堅定意志做去必可成功，我們的辛苦是光榮的，希望林業同人，不要灰心，更要振作精神，以完成整理森林的使命」。⁸²

在徐慶鐘發言後，林渭訪、周慧明、黃範孝也各自提出對臺灣林業的看法。⁸³無可避免的，即便徐慶鐘在場，討論的重心逐漸移到現行林政與林產分治的問題上。這時，梁希表示他要發言。他先跟聽眾分享目前的兩大學說：一者認為機構是一種「組織」，「組織完善，機構健全，則技術纔有所寄託，可以盡量發揮，否則工作效力大形減少」。為幫助聽眾了解，他說，「譬如人身，必須機

⁸⁰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林業座談錄〉，《林產通訊》，第2卷第7期（1948年4月），頁35。

⁸¹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林業座談錄〉，《林產通訊》，第2卷第7期（1948年4月），頁35-36。

⁸²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林業座談錄〉，《林產通訊》，第2卷第7期（1948年4月），頁36-37。

⁸³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林業座談錄〉，《林產通訊》，第2卷第7期（1948年4月），頁37-39。

構健全，然後談得到工作，植物亦復如是，因此，各事業機關之組織，有時等於鐵路上機車之構造，機車構造完善，則列車運轉自如」。與之對照，梁希表示，亦有學者「輕視機構」，「以為機構之調整，譬如房屋內之家具布置，書桌、椅凳、衣櫃書架，甲乙丙三人布置方式各自不同，其實家具不變，實用上所差有限」。梁希說，聽眾可能會感到驚訝，執世界林業之牛耳的德國林業，採用的便是此說，「例如德國各省之林業機關，或屬於農林部，或屬於財政部，似無一定，而林業成績卻相同」。同樣的，他補充，臺灣林業與林學界常討論日本殖民臺灣時林業組織的變動，原因即出在日本林業界也為此學說的信徒。⁸⁴

那麼，臺灣林業該採用那種學說？梁希表示「個人希望提高森林地位，擴大林業範圍，獨立設一臺灣省林務處」。他的理由有三：首先，他說，「幾天前徐處長曾和我談及目前農林處，說森林的事務最多」；若是如此，他認為「農與林並立，並非過分」。再者，他表示，「臺灣之林業粗放，為求集約經營，應當設法擴大其機構」。第三，他注意到，「臺灣山林管理所轄區的面積，少者三萬公頃，多者三十餘萬公頃」，而德國林業「每轄區至多只有三千公頃」。他拋出如下問題：「我們何能做到十倍或百倍於德人的工作，何況光復後所有日籍高級林業技術人員均已回國？」他的回答是，考慮到「目前缺乏人才，而應付十倍或百倍於德國事業，勢必力竭」，只有「向政府爭取成立林務處，以求臺灣林業的獨立」。⁸⁵

在闡明他的立場後，梁希加了個但書。他說「中國有一通病」讓他非常擔憂，即「機關變動，往往牽涉人事，一朝天子一朝臣，使工作人員心緒不〔寧〕，人人懷五日京兆之心，計畫焉能進步？」無論如何，考慮到林政與林產之分治已成為臺灣林業的亂源，梁希總結，只要不牽動人事，「要變，就應澈底的變」。換言之，他認為，不論是林產管理局從農林處手中奪回林政，又或者在農林處林務科下增設林產，均非釜底抽薪之計。臺灣林業需要一個省府二級機構來管轄之；並且，為避免人事大搬風；最合理的作法應當是，林產管理局先完成

⁸⁴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林業座談錄〉，《林產通訊》，第2卷第7期（1948年4月），頁39。

⁸⁵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林業座談錄〉，《林產通訊》，第2卷第7期（1948年4月），頁39。

林政與林產的統一，再由省府將之升級為林務處。⁸⁶

對於1947年9月以來即日趨炙烈的林政與林產之爭，梁希與朱惠方一語似有一錘定音之效。兩位林業權威離臺後，魏道明已準備裁撤徐慶鐘一手打造的林務科，將林政、林產與經理3組，連同山林管理所10所，與模範林場3處，歸還給林產管理局。唐振緒、邱欽堂等林產管理局幹部即將達成其朝思暮想的林業一元化。⁸⁷

然而，就在這群技術官僚慶賀他們的勝利時，地方林政已惡化至他們難以想像的程度。5月28日，在得知山林管理所等機構將在6月1日回歸林產管理局，唐振緒召開「林政檢討會議」，邀請10位山林管理所所長來局一聚。在致詞時，他表示，即便過去的「林業林務行政未盡理想」，他將以「大無畏的精神」推動組織革新。他期待各位所長能「毫無顧忌」地抒發己見，與局裡幹部共謀解決之道。⁸⁸

嘉義山林管理所鄭月樵所長自陳，在造林育苗方面，1948年預定新植550公頃，目前只完成60公頃；造林失敗之處需要補植，預定為292.67公頃，目前只達11公頃。新竹山林管理所徐兆莘所長指出，1948年1至3月預定造林面積298公頃，惟因氣候及經費短缺，雖已達成71%的進度，但樹苗發展遲緩，成效甚差；該所秋季預定造林507公頃，眼下樹苗不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為何會陷入如此困境？鄭月樵所長表示，各縣市政府爭奪林產處分權，甚至擅自處分；農林處過去曾去函各縣市嚴正表明管轄權，亦被無視。此外，他直言當今保林政策的問題，包含檢舉盜伐並無獎金，基層人員待遇甚差等。他表示他曾向省政府、農林處及各縣市政府等機關函文或呈文建言，亦曾經自行研究法規，將研究成果及建議上呈農林處，但常常石沉大海。⁸⁹ 其他山林管理所面臨的困境與嘉義、新竹兩所可說大同小異，不外乎制度疊床架屋、管轄權混亂、造林經費不足、人員待遇

⁸⁶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林業座談錄〉，《林產通訊》，第2卷第7期（1948年4月），頁39。

⁸⁷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本局林政檢討會議〉，《林產通訊》，第3卷第6期（1948年7月），頁1-12。本段引自第1頁唐振緒之開幕致詞。

⁸⁸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本局林政檢討會議〉，《林產通訊》，第3卷第6期（1948年7月），頁1-12。本段引自第1頁唐振緒之開幕致詞。

⁸⁹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本局林政檢討會議〉，《林產通訊》，第3卷第6期（1948年7月），頁1-12。本段引自第9頁嘉義山林管理所鄭月樵所長的發言。

差與法規不夠周詳等。⁹⁰

考慮到過去山林管理所不歸林產管理局管轄，這或許是唐振緒、邱欽堂等林產管理局幹部首度聽聞基層心聲。邱欽堂拋出如下問題：6月1日後，當林政回歸林產管理局，即林業真正「一元化」後，「以林養林」究竟可不可能？他想要知道的是，以目前林產管理局的伐木收入，能否撐起全臺的造林與保林業務？技正葉國和直言不可能；作業組黃組長亦表示，若無省府補助，以林養林可說是空中樓閣。唐振緒強打起精神，表示「要我打老虎亦有打老虎的決心，毫無畏懼，我天天都收到恐嚇信，我對此點也不怕，怕的是大家林務辦不好」。⁹¹然而，若一元化之後的林產管理局得仰賴省府補助方能維持，誰擁有權力來決定補助？林產管理局高層想必心知肚明，關鍵在於農林處。

林政與林產之爭彷彿又回到了原點。唐振緒、邱欽堂等技術官僚或許在「理念」上拿下一回合，但問題是，讓此些理念得以落實的物質條件，或者說得以讓以林養林成真的森林，正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劣化中。1948年6月的林產管理局，宛若一艘處處漏水的大船，載浮載沉，雖說在「正確的」航道上，卻駛向更為凶險、難以逆料的未來。

玖、結論

1947年間臺灣省府成立初期的臺灣社會、經濟、政治與環境的狀況為何？對此問題，研究成果集中在政治與經濟面，環境史的考察仍付之闕如。本文以林業為例，特別針對「林政與林產分合不定」此林業史上惡名昭彰的事件，結合官僚研究的視野與多元史料，探討該事件的前因後果。

⁹⁰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本局林政檢討會議〉，《林產通訊》，第3卷第6期（1948年7月），頁1-12。本段引自第6、7頁新竹山林管理所徐兆莘所長及嘉義山林管理所鄭月樵所長的發言。

⁹¹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本局林政檢討會議〉，《林產通訊》，第3卷第6期（1948年7月），頁1-12。本段引自第9頁唐振緒局長的發言。

本文分析顯示，臺北帝大出身、負責林政的農林處長徐慶鐘，以及康乃爾大學水利工程學博士的林產管理局長唐振緒，均反對省主席魏道明簡單地將林政與林產分而治之的構想，主張理想的林業應走向整體與一元化。他們的差異在於對整體與一元化的想像不同。身為日治時期臺灣本土菁英的徐慶鐘，在以生理生態學的視野檢視殖民農業政策後，認為殖民政府以科學來推動農業的理念值得欽佩，但對於當中母國優先、忽略臺灣之特異性，以及排除臺灣人之參與的差別政策，大為不滿。以類似的邏輯，他認為臺灣林業要能在殖民政府打下的基礎上精益求精，同時又切斷其殖民過去，就有必要參照殖民林業的經驗，將林政與林產予以分開後，再由前者來駕馭後者，這也意味著農林處必須是臺灣林業的最高主管機關。與之對照，唐振緒親炙1930年代以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馬首是瞻的規劃風潮，認為臺灣林業要能步上正軌，就有必要確保該局之功能與存在目的不是只有生產而已；或者，更準確地說，林業生產的目的及手段、生產量與時程等細節，都得從整體與多目標的視野來排序與規劃，此即為唐振緒致力推動的「林業一元化」。綜觀徐慶鐘與唐振緒之一元化的差異，或許可以這樣比擬：生理生態學出身的徐慶鐘，認為林業就像個身體，林政部門就相當於腦袋，而林產則為四肢；林政駕馭林產，是理論與實務上的必然。工程師唐振緒則主張，林業如同機器，該機器要有生產力，且生產要有效率，關鍵在於當中各部分能否整合；對他而言，林政與林產均是此機器中不可或缺的要件：分治會導致機器失能，林政統御林產則易造成機器空轉，兩者均非國家與人民之福。

林政與林產之爭實為兩種整體觀的對決。徐慶鐘先取得上風。1947年9月，儘管百般不願意，唐振緒還是將林政、林產與經理三組交給徐慶鐘；徐慶鐘則招募其在臺北高校、臺北帝大的學弟，於農林處中設立林務科統轄之。唐振緒並未就此屈服。首先，經此調整，該局管轄的林地面積與職權急遽縮減，從原本占臺灣土地一半以上之國有林的主管機關，成為一個性質類似林產公司、但得以平價供應各界木材、得負責全臺造林、又不容插手林業政策規劃、且掌管之林地只占臺灣國有林之5.7%的四不像。四不像的林產管理局除了為該局被賦予之林產管理與造林業務帶來戕害外，亦造成基層的兩難，且衝擊當時林業人的專業認同。於是，當徐慶鐘的林政一元化已成定局，不只唐振緒、張韶初、黃範孝、孟傳樓等戰後來臺服務的外省籍專業人才，如邱欽堂、邱文球、康正立、康健時等本土林業人也頻頻出手，挑戰農林處之於臺灣林業的權威。林業社群就其專業認同及林

業一元化的抗爭，又在國共內戰期間，中華民國對臺灣木材的高昂需求下，不停加深加廣，將主持地方林政與林產機構、伐木業者、各縣市材商、聯合國救濟總署之林業顧問、中華民國之林業權威等一一捲入，最終釀成戰後初期臺灣最大規模的環境爭議，甚至可說是戰後臺灣首波的環境爭議。

然而，就在各界爭論著什麼才是臺灣理想的林業時，臺灣森林卻不停惡化。關鍵在於基層官僚的困境。爭議期間，當掌權者與主事者對於政策皆莫衷一是，甚至相互制衡時，基層很難有所作為。甚至可以說，當關於理想的論辯越激烈，基層越無所適從，森林破壞與劣化的趨勢更難以遏止。至1948年中，雖說爭議已大致底定，由林產管理局勝出，但可說大勢已去。臺灣森林的條件已難以支撐起該局念茲在茲的以林養林，遑論以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馬首是瞻。

從戰後臺灣史的角度，本文意涵有二：首先，本文銜接了臺灣官僚研究的缺口，一方面把研究者關心的時代往前延伸至戰後初期；另方面，當絕大多數的官僚研究係集中在高層，本文則往下紮根，把視角放在徐慶鐘、唐振緒、邱欽堂等中層官僚，乃至於如徐兆莘的基層人員。藉此往前與往下延伸的分析視野，本文認為，研究者可再評估「省籍」在戰後初期臺灣史扮演的角色。我們並非否認省籍的影響力；但無論如何，省籍不會是唯一區隔人群的界線，且省籍界線要發揮作用，還涉及與其他界線的重合程度。本文分析顯示，至少在林業此高度技術性的領域，當不同官僚集團在競爭發言的正當性與權威時，關鍵因素並非省籍，反而是專業，又或者是浸淫在各自專業中所磨練出的「心性」與思維模式。

再者，本文也希望拉長戰後臺灣環境史的向度。對此主題，研究者常告訴讀者，臺灣經歷急遽之工業化與都市化，造成大自然反撲後，人民覺醒，環保多少成為社會共識，再加上民主開放等政治局勢，環境爭議方具備足夠的發生條件。本文分析則顯示，至少就森林此「環境」而言，政府對其保護與保育的思考，遠比既有研究所言的還要早。我們並非指稱，魏道明主持之省府為民主、開放、深具環保意識的執政者；我們要說的是，在二二八事件的教訓後，當行政長官公署垮臺、省政府在倉促中成立、政府上下與社會各界均亟思改革時，「青黃不接」意外地提供百家爭鳴的條件，且森林保護與保育為「爭鳴」的場域之一。由此看來，戰後臺灣環境史就不能只著墨1980至1990年代的環境運動，而勢必得重新評估環境在牽動戰後臺灣政治、文化與社會變遷上的角色。本文將林政與林產之爭定位為戰後臺灣首次的環境爭議，期能對戰後臺灣環境史之開展有所貢獻。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個人史料》（臺北，國史館藏）
〈鍾毓訃聞及生平事略〉。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林務局及所屬人員任免〉。
《臺灣省政府》（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農林處人員任免〉。
〈林產局組織規模〉。
〈農林處人員任用甄審〉。
《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新竹山林所人事任免（0037/032.34/150/5）〉。
〈各縣市試驗所人員任免案（0037/032.34/171/4）〉。
《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總務／人事／任免／總節〉。
〈經建／農林／林業／總節〉。

二、史料彙編

- 新竹縣山林管理所編，《新竹縣山林管理所概況》。新竹：新竹縣山林管理所，1949年。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臺灣省統計要覽：第二期》。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年。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出版委員會編，《臺灣林產管理概況》。臺北：臺灣省政府農林處，1948年。

三、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 「科學行政在臺灣」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徐慶鐘博士論文集：科學行政在臺灣第一輯：作物生理生態學研究及應用》。臺北：「科學行政在臺灣」論文

集編輯委員會，1977年。

陳許碧梧口述，許雪姬訪問，〈陳許碧梧女士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5期（1994年2月）。

楊基銓撰述，林忠勝校閱，《楊基銓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

四、雜誌、報紙

《公理報》，臺北，1948年。

《林產通訊》，臺北，1947-1950年

《臺林》，臺北，1947年。

《臺灣民聲日報》，臺中，1946-1980年。

《臺灣省林業試驗所通訊》，臺北，1947年。

《臺灣農林月刊》，臺北，1947年。

五、專書

丁國平，《唐振緒》。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1996年。

王國瑞，《臺灣林業人物誌：第一輯》。臺北：王國瑞，1991年。

沈克夫（Paul Zehngraff）著，康瀚譯，《臺灣之林業情形》。臺北：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1953年。

松田康博著，黃偉修譯，《臺灣一黨獨裁體制的建立》。臺北：政大出版社，2019年。

邱文球，《臺灣林業史概論及其林業之特異性》。臺灣：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林務局，1947年。

姚鶴年，《臺灣省林務局誌》。臺北：臺灣省農林廳林務局，1997年。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

徐慶鐘，《改進臺灣林業的研究》。臺北：中央委員會設計考核委員會，1956年。

許雪姬著，羽田朝子、殷晴、杉本史子譯，《離散と回帰：「満洲国」の台湾人の記録》。東京：東方書店，2021年。

陳勇志，《美援與臺灣之森林保育（1950-1965）——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關係之個案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0年。

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臺灣書房，2012年。

歐素瑛，《臺北帝國大學與近代臺灣學術的奠定》。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20年。

Philip, Selznick. *TVA and the Grass Roots: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Formal Organiza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9.

Pritchett, Herman C.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A Study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3.

六、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中國林學會，〈朱惠方副理事長逝世〉，《中國林業科學》，第4期（1978年，出版月份不詳）。

卞鳳奎，〈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臺灣人民抗日文宣組織——以上海、廈門為中心〉，《檔案季刊》，第12卷第1期（2013年3月）。

何鳳嬌，〈戰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事業地的接收與經營〉，《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6期（2008年6月）。

林佩欣，〈他山之石：國民政府在臺灣的業務統計體系接收與重建（1945-1949）〉，《興大歷史學報》，第31期（2016年12月）。

林蘭芳，〈戰後初期資源委員會對台電之接收（1945-1952）——以技術與人才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9期（2013年3月）。

洪廣冀，〈林學、資本主義與邊區統治：日治時期林野調查與整理事業的再思考〉，《臺灣史研究》，第11卷第2期（2004年12月）。

洪廣冀，〈戰後初期之臺灣國有林經營問題：以國有林伐採制度為個案（1945-1956）〉，《臺灣史研究》，第9卷第1期（2002年6月）。

洪廣冀、張家綸，〈「建設新臺灣」：黃維炎與戰後臺灣的林業接收〉，《臺灣史研究》，第29卷第3期（2022年9月）。

洪廣冀、張嘉顯，〈「林務局之惡聲狼籍，布於全島」：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臺灣林業〉，《臺灣史研究》，第30卷第1期（2023年3月）。

徐慶鐘先生周甲紀念籌備會，〈徐慶鐘先生事略〉，收入徐慶鐘先生周甲紀念籌備會編，《徐慶鐘先生周甲紀念論文集》。臺北：徐慶鐘先生周甲紀念籌備會，1967年。

張國暉，〈國族渴望的巨靈：臺灣科技官僚治理的中國脈絡〉，《國家發展研究》，第12卷第2期（2013年6月）。

許雪姬，〈二戰前後在漢口的臺灣人〉，《臺灣史研究》，第26卷第1期，（2019年

3月)。

陳純瑩，〈戰後臺灣森林警察之設置與功能（1946-1958）〉，《東吳歷史學報》，第9期（2003年3月）。

陳翠蓮，〈二二八事件後的臺灣省政府人事〉，《法政學報》，第8期（1997年8月）。

曾文亮、王泰升，〈被併吞的滋味：戰後初期臺灣在地法律人才的處境與遭遇〉，《臺灣史研究》，第14卷第2期（2007年6月）。

曾華璧，〈臺灣的環境治理（1950-2000）：基於生態現代化與生態國家理論的分析〉，《臺灣史研究》，第15卷第4期（2008年12月）。

湯熙勇，〈戰後初期臺灣省政府的成立及人事佈局〉，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

黃信勳、徐世榮，〈戰後臺灣的環境治理進路：一個生態現代化視角的考察〉，《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第52卷第4期（2014年12月）。

鄭梓，〈戰後臺灣省制之變革：從行政長官公署到臺灣省政府（1945-1947）〉，收入鄭梓著，《戰後臺灣的接收與重建：臺灣現代史研究論集》。臺北：新化圖書公司，1994年。

謝明如，〈臺灣植物病理學的第一人——松本巍與臺灣植物病理學之建立〉，《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第66卷第3期（2013年9月）。

瞿宛文，〈民主化與經濟發展：臺灣發展型國家的不成功轉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4期（2011年9月）。

瞿宛文，〈臺灣經濟奇蹟的中國背景：超克分斷體制經濟史的盲點〉，《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4期（2009年6月）。

Bear, Laura and Mathur, Nayanika. "Introduction: Remaking the Public Good." *The Cambridge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33:1 (March 2015).

Bourdieu, Pierre, Wacquant, and Farage. "Rethinking the Sta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Bureaucratic Field." *Sociological Theory*, 12:1 (March 1994).

Chadarevian, Soraya De. "Laboratory Science versus Country-House Experiments: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Julius Sachs and Charles Darwin."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9: 1 (March 1996).

Cooper, Davina. "Prefiguring the State." *Antipode*, 49:2 (March 2017).

Heggie, Vanessa. "Higher and Colder: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Boundaries in High Altitude and Antarctic Research Station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6:

6 (December 2016).

Kingsland, Sharon E. "The Role of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Ecology." in Ian Billick and Mary V. Price, eds., *The Ecology of Place: Contributions of Place-Based Research to Ecological Understand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Korfiati, Ioanna P. "Classifying Like a State: Land Dispossession on Eastern Crete's Contested Mountains." *Antipode*, 52:5 (September 2020).

Lea, Tess. "Desiring Bureaucrac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50 (October 2021).

Li, Cheng and Liu, Yanjun. "Selling Forestry Revolution: The Rhetoric of Afforestation in Socialist China, 1949-61." *Environmental History*, 25:1 (January 2020).

Strasser, Bruno J. "Laboratories, Museums, and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lan A. Boyden's Quest for Objectivity in Serological Taxonomy, 1924-1962."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40: 2 (Spring 2010).

Wacquant, Loïc. "Crafting the Neoliberal State: Workfare, Prisonfare, and Social Insecurity." *Sociological Forum*, 25:2 (June 2010).

七、學位論文

邱欽堂，〈臺灣民有林振興策〉（臺北：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卒業報文，1929年）。引自《日治時期臺灣農業史料數位典藏計畫卒業報文》，國立中興大學藏，登錄號：nchul-tb-023565。

夏良業，〈魏道明與臺灣省政改革（1947-1948）〉。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八、網路資料

〈胡煥奇〉，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網址：<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2020/10/29日點閱）。

國史館館刊 第 76 期